

# 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

李 國 祁

- 一、前言
- 二、經世致用觀念的演變
- 三、道光年間經世致用之學
- 四、咸豐同治年間經世致用之學的發展
- 五、結論

## 一、前 言

我國近代的思潮及其演進，約略可分為三：一、是直接繼承於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二、是因西力衝擊而產生的應變圖新思想，三、是兩者合流的中體西用論。三者間的關係既是先後啟承，也是相互影響。所不同的是：經世致用思想淵源於傳統，其內涵表現傳統亦最真切，而應變圖新，則因是對西力衝擊的因應，其內涵雖仍具有傳統的色彩，但畢竟含有濃厚的接受西化的成份。中體西用論則是謀將兩者不同的思想融合調適，使之成為新舊兼具的在本土成長的新個體。在近代這將近百年間的時間範疇裏，這三種思想的表現可以說是錯綜複雜的。常常在同一時間內或某一個人思想中既有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也有應變圖新及中體西用論的成份，每因外在的對象不同，產生不同的反應。因之治近代史或思想史的學者們對當時人物思想的分類產生各種不同的標準：有人強調其應變圖新的成份，有人看重其經世致用思想的淵源，更有人觀察其新舊融合的中體西用適調性。於是在不同的文章裏以及不同學者的心目中，同一時代以及同一人物思想的闡釋，產生變化多端的多樣性。本文為求有清晰的分類與自認為有客觀的標準起見，在方法上採取將道咸同五十四年間的重要人物思想，作整體的觀察，然後加以論定。論定的標準是觀察其思想中所含的現代性，並以此來說明何以在此五十四年間我國近代化運動難以得到成功。

再則由於此五十四年共包含三個朝代，道光咸豐及同治，而咸豐僅有十一年，

同治亦僅有十三年，故將此五十四年分兩段來討論，即道光朝與咸豐同治朝，並互相比較，俾看出其異同以及演進的相互關係。此五十四年間具有卓越思想的人物很多，而且人物生存的時間亦參差不齊，故在取樣上取其有重大影響力者，時代的劃分上，取其思想成熟並有強大影響力時期，因此如魏源將其劃為道光朝的代表人物，曾國藩則劃分為咸同年間的思想家。在此一時代裏李鴻章是舉足輕重的政治領袖，由於其整個思想淵源於傳統的經世致用成份較少，應變圖新成份較多，故擬將來撰寫應變圖新思想論文時，再予討論。張之洞亦然，他是中體西用論的代表者，亦擬於撰寫此方面論文時再論。這是要事先予以聲明的，其他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情況相同。

## 二、經世致用觀念的演變

經世致用的觀念在我國由來已久，可說是讀書人治學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一種抱負，並不一定限於儒家才有，但因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而漢儒又以通經致用作為讀經治學的目的，於是逐漸演變成儒者的一種理想，是具有相當的入世與積極精神的。因此在宋儒大力提倡內聖外王觀念時，被視為是達成此一目的必要途徑。此一名詞的淵源，似最早可溯自易經，在周易正義卷一屯中，有「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易正義卽曾注疏稱：「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故云君子以經綸也①。」顯然已有類似的含義。此外在莊子齊物論中亦有：「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②。」唯此處之「經世」不作今日之經世解，是「紀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流傳人世」之意。後漢書西羌傳論中有：「忘經世之遠略」③，此一經世方有日後經世致用一詞中經世之含義。故經世致用一詞的正式使用，不僅與漢儒的通經致用有關，極有可能亦是漢代以後之事。宋儒在經世致用觀念的演變上，是有重要貢獻的。他們一方面繼承漢儒的通經致用觀念，認為「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④，要經義與治事並重，另方面又特別看重大學的修齊為治平基礎的看法，於是透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層次，將尊德性

①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大化書局本，上冊，周易正義，卷一，頁七。

②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中華書局本，卷十六，頁廿四。

③ 范曄，後漢書，卷八七，鼎文書局本，頁二九〇〇。

④ 王安石即如此主張，見劉子健，「經世——關於英譯名詞和史料分類的討論」，清華大學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討會論文，頁一。

道問學與經世濟民相結合<sup>⑤</sup>，使內聖外王成為經世致用的最高境界。在此情況下，南宋呂祖謙編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而宋元之際的馬端臨編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自序稱：「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紀書信而有證者，謂之文。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故命名其書曰文獻通考<sup>⑥</sup>。明代繼承此一傳統，故陳九德編有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陳其棟編皇明經濟文輯二十三卷。此處所謂的經濟，顯然即是一般所謂的經世之意。明代在另一方面陽明學大興，陽明學原主張致良知與知行合一，本是知識與實踐並重，已含有相當的經世致用意味，祇因陽明學的所謂知，已非漢儒的通經。更由於其另一主張心即是理的極度發揮，故至明末陽明學發生流弊時，連尊德性與道問學均談不到了，更何況經世濟民。因此馮應京編撰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十四卷，萬表編皇明經濟文錄四十卷。明亡以前復社幾社更推動經世運動，徐孚遠陳子龍及宋徵璧編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根據許淑玲的碩士論文，可知其目的確在經世致用，唯其所謂的經世在根本上實非通經之意，對於尊德性，亦未十分強調。松江知府方岳貢在皇明經世文編的序文中曾說：

「學士家不知近事，往往是往古而非當今，然而傳曰法後王，則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豈有不足者耶<sup>⑦</sup>？」

氏對所輯諸文甚為讚許，認為語財賦則管商桑孔不足言其能，論掌故則鄭玄王肅不足以侈其學，論河漕則王景韋堅無以驕其治<sup>⑧</sup>，顯然對明臣諸人的貢獻殊感輝煌而驕傲的，充份反映出該書的主旨旨在法後王，以當代之人文經當代之國事。故日後顧炎武諸人對這種陽明學流弊不感滿意，主張經學即理學，學者須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好古敏求，使顧炎武等所主張的經世致用，一方面有皇明經世文編編者所主張的，以當代之人文經當代之國事，另方面亦有通經致用及尊德性道問學與經世濟民相整合的用心。不幸由於日後清政府的箝制言論，屢興文字獄，與士人的懼禍逃避現實，終至於非僅一般的經世致用含義完全喪失，甚至所謂通經，亦僅在用訓詁考據的方法去釋注校訂經書。故乾嘉近一個世紀的漢學昌盛時代，對匡世濟民的儒者積極經世思想，助益無多。於是十九世紀初期復乃有包世臣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再出而倡導經世致用之學，魏源並為賀長齡編纂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因林則徐之四洲志而成海國圖志一書。

⑤ 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七十五年，頁二。

⑥ 文獻通考，商務，頁考三。

⑦ 皇明經世文編，國聯圖書公司本，第一冊，頁廿六～廿七。

⑧ 同上書，第一冊，頁廿一～廿五。

### 三、道光年間經世致用之學

道光時期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繼承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觀念及乾嘉考據餘風，在態度上極注重邊事與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及西洋諸國地誌，如龔自珍精於西北地理，主西域建省，徐松著新疆事略及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梁廷柵著海國四說，魏源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等。對於道問學，他們雖亦主張通經致用，甚至尊崇漢儒，但因反對考據之學，故如龔自珍魏源等均屬今文學派，注重公羊傳的微言大義，要求改革時弊，充滿改革的積極精神。與顧炎武及明末復社幾社諸人又不相同，更具有實用觀念與講求時效的致用旨意。魏源於皇朝經世文編敍文中曾說：

「然昨日之歷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⑨！」

另於皇朝經世文編編例中亦說：

「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紓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迺其綱領，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時務莫切於當代，萬事莫備於六官，而朝廷爲出治之原，君相迺羣職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綱維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⑩。」

正因為如此，故他們之中不少人不僅講求刑名錢穀等經濟之學，亦注重水利漕運，如包世臣林則徐等；甚至兵學，如魏源龔自珍等。此即張灝在其「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一文中所謂的治法⑪。對於尊德性中所強調的禮，似祇限於禮儀，是希望透過教化儀節的建立，而達到道德秩序的維繫。對於心性則較少有系統的討論⑫。

由於此時期中國已開始承受強大的西力衝擊，而鴉片戰敗後，此一衝擊更是如同當頭棒喝，晴天霹靂，故他們亦注意到中外關係，以及因應之方，如包世臣在鴉片戰前即注意到洋貨的入侵，以及主張佔領新嘉坡拒阻英人的東進，林則徐於鴉片戰爭期中的購買西方武器及用民制夷，魏源於鴉片戰後力主以夷制夷，均是想起敝振衰，重振中國聲威，拒阻西力的入侵。唯在觀念上，他們仍然相信中國是天朝上國，雖船堅炮利一時不如西人，但不足懼。

⑨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文海本，第一冊，頁一。

⑩ 同上書，第一冊，頁五。

⑪ 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七十三年，頁十六～十七。

⑫ 同上文，頁十七～十八。

整個道光時期的經世致用思想，可以龔自珍與魏源為代表。龔自珍（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人，出身書香士紳家庭，其祖先自高祖而下皆有科舉功名，母段氏係乾嘉小學大家段玉裁之女，通詩文，著有綠華吟榭詩草。自珍幼隨母啟蒙學習詩文，十二歲外祖父段玉裁授以許氏說文部目，以經說字，以字說經，十四歲研讀古今官制，十六歲閱讀四庫全書提要，十七歲游太學，治金石之學。故其少年時代之學識基礎實奠定於漢學，留心經世致用之學則在成年以後。廿五歲赴上海父親任所，乃得與吳縣鉗非石（玉樹）錢塘何夢華（元錫）等廣搜典籍，肆意著述，貫穿百家，究經世之務。廿八歲於京師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從此確立以公羊為基礎之經世致用思想。更與林則徐宋翔鳳及魏源等游。自珍雖治學博雜，唯不得意於科舉，前後參加鄉試會試十次，達廿年，於卅八歲方賜同進士出身，故宦途坎坷，僅官至禮部主事（另說官至蘇松太道）<sup>⑬</sup>。也許正因為如此，行為略有放誕。在經世致用思想上，自珍堅信：「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sup>⑭</sup>，故服膺易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力主興利除弊，適時變革。而歷代衰亡為新朝代所取代，則是因「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故欲國家久遠，必須及時革新<sup>⑮</sup>。他認為治民之要在養民，而養民則必須注重食、貨、富，改善人民生活，使社會間貧富差距不可太懸殊<sup>⑯</sup>。他將論語的「齊之以禮」，解釋為「齊貧富」，為此並著平均篇<sup>⑰</sup>。因此他的經濟政策是如同一般的儒家法家思想，視商人為剝削階級，有礙於均富的發展，認為農之始仁第孝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為也<sup>⑱</sup>。主張重農抑商<sup>⑲</sup>。政府為體恤農民，更當簡賦，對清初的行一條鞭法及康熙五十一年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大為稱道，視為「仁莫大焉」<sup>⑳</sup>。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經濟思想，仍是深受儒家傳統影響，並未有任何突破之處。

對於當時的政治，特別是中央政府的政風，自珍認為積弊甚深，各種禮儀，亦

⑬ 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七五～二七六。李柏榮，魏源師友記，及清史列傳均作龔定庵官至蘇松太道（見該書頁廿七；清史列傳，啓明本，頁四五〇）

⑭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補編，卷二，頁二下，上大學士書。

⑮ 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七七。

⑯ 同上文，頁二八〇～二八一。

⑰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文集，卷上，頁二上～三上，平均篇；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二八一。

⑱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文集，卷上，頁十五上，農宗。

⑲ 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二八一。

⑳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續集，卷二，頁十五，地丁正名。

多不合理，均須加以改革。他認為爲政之要在拔擢人才，而拔擢人才，則當不過份重視資歷。注重資歷將使人才銳氣消磨殆盡，而至於「奄奄無生氣」；任官當授之以權，分層負責，唯亦當控制其言論。爲國君者僅當「總其大端」，不可有察察之明，更不可「苛細以繩其身」。官員必須厚其俸祿，如此方可養其氣度，全心爲國爲公<sup>②</sup>。顯然其看法大體仍未出儒家傳統思想。

龔定庵在思想上最爲後人稱道者，是他的熟知蒙新邊疆地理<sup>③</sup>，留心邊政，主張建西域行省，對蒙古採取宗教的統治策略<sup>④</sup>。他與一般傳統儒生不同，於清政府的開疆拓土稱道不已，認爲西域建省可以移民實邊，開發該區，使成爲中國本部的一部份，而且此種移民實邊必須有計畫的進行，即由公家「先期斬危崖，割反嶺，引深泉，瀉浸塗」，公家亦須供給帳房牛犁農具及糧種。開墾期間廿年免其賦稅。積極經營移民實邊，以七年爲期。對於當地的土著，他亦主張「不以駝羊待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給予漢人同等待遇，俾能以邊安邊。在行政區劃定方面，他認爲新疆全境可劃爲十一府三直隸州二州五十縣，設總督巡撫統轄之。另當獎勵文教，推行科舉制度，使中華文化在此生根成長<sup>⑤</sup>。故他的經營新疆建議，實亦即左宗棠劉錦棠諸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新疆所推行者，是一種內地化政策，希望透過此一內地化政策，使西域與中國本部凝聚成一整體。而尤難能可貴者，他提出此一建議時，年僅廿九歲，時在嘉慶廿五年（一八二〇）。

對於西方入侵的因應，由於他身當鴉片戰爭時代，故於鴉片的輸入，看法與林則徐諸人相同，是嚴禁論者，認定鴉片即是漢書五行志中的食妖，對於吸食販賣製造者均應處以死刑。他料定禁烟勢必引起中外糾紛，因此主張以武力對付西人及奸民。他與當時大多數士人看法相同，認爲西人輸入之貨物呢羽鐘表玻璃燕窩等，皆不急之物，中國應予禁絕。相信禁杜之，則蠶桑之利興，木棉之利重，中國經濟將轉殷實。對互市之利，僅認爲米之輸入，對中國有益<sup>⑥</sup>。顯然他與其他同時代人看法相同，是不了解中外貿易是對雙方皆有利益的。爲了因應西洋，他主張講求火器<sup>⑦</sup>，甚至早在嘉慶廿五年（一八二〇），即主張頒製西洋奇器，俾便往來戈壁，攜

② 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七八～二八九。

③ 蔡冠洛重編，清史列傳，啓明書局本，頁四五〇，龔自珍。

④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文集，卷中，頁二十二下～二十三上，與人箋。

⑤ 同上書，文集，卷中，頁三上～七下，「西域置行省議」，頁十五下～十八上，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補編，卷二，頁一上～二下，「御試安邊綏遠疏」。

⑥ 同上書，補編，卷二，頁十一上～十二下，「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

⑦ 同上註。

帶飲水<sup>⑦</sup>。如果此可視為師夷長技的一種，則顯然較林則徐與魏源早了約二十年。龔自珍卒於道光廿一年（一八四一），亦即鴉片戰爭後期中國在戰場上無法抗拒英人時，在卒前的一年，他對因應英人的侵略態度已趨緩和，主先改革內政，力求自強，而後抗強敵，是要安內先於攘外的。認為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民驕政疲，無力與英人相爭<sup>⑧</sup>。

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七）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父武舉出身，曾任江蘇省州縣巡檢。魏源幼時聰穎過人，才思敏捷，個性沉靜嗜學，喜夜讀。七歲入塾就讀，十五歲中秀才，二十歲（一八一三）舉拔貢。次年因貢舉隨父入京，途中經過八卦教亂事區域，滿目瘡痍，曾作詩曰：「借問釀寇由，色哽不敢唏<sup>⑨</sup>。」隱然有求民隱匡時弊之志。魏源少年時代究心陽明學及讀史，入京後館於李春湖家，受知於侍郎周石芳（系英），因周之揄揚，名動公卿。曾從胡承瑛講求漢學，姚學塽講求宋學，及劉逢祿研習公羊，更與董桂敷龔自珍切磋古文辭及經世之學<sup>⑩</sup>。嘉慶廿四年（一八一九）再度入京，中順天鄉試副榜，後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故魏氏早年治學廣博，雖在思想上啟蒙於陽明學，但漢學宋學皆通，更及於公羊學，因喜以今文學理論釋經，故被視為今文學家及公羊學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因赴順天府試，三度入京，刊印其所編著大學古本，附孝經集傳，及曾子章句，特別表揚儒家思想中之孝與誠。以為朱熹所謂：「言孝自有親切處，何必言嚴父配天」，似與孔子曾子及張載之說不合。而大學之中心思想在致知與誠意，宋儒重致知忽誠意，實有所誤，故以古本大學來證明儒家的道問學與尊德性，確有經文根據，可並行不悖。此外魏源極推崇中庸易經，認為兩書義理相同之處甚多，其要在「盡心、知性、知天」，是知行並重，視心體為一切根本的<sup>⑪</sup>。魏源有考訂古經的癖好，而他的考訂古經，常注重今文學理論，故清史列傳稱他：「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sup>⑫</sup>。」為此他著有書古微、詩古微等。

⑦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文集，卷中，頁六下至七上。

⑧ 同上書，補編，卷四，頁四，頁十下～十一上，與人箋。

⑨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近史所，民七十三年，頁三五九～三六一。

⑩ 王家儉，魏源年譜，中研院近史所，民五十六年初版，七十年再版，頁八；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三六一。

⑪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三六一～三六三。

⑫ 蔡冠洛重編，清史列傳，啓明書局本，頁四二〇。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源在學術思想上表現出受有兩大影響：一是早年陽明學的啟蒙，一是崇尚西漢人治學的理論，不僅他的心體為一切根本，道問學與尊德性可並行不悖，知與行必須同時並重的看法，由此而產生，甚至他的這種學術思想上的見解，亦對他的經世致用觀念產生相當重大影響，是以此為根本基礎的。故魏源的思想日後雖因主張因時制宜而以夷制夷，有縱橫家的傾向，但在根本上應仍屬於儒家的。

魏源的經世致用思想在基本上雖出之於他對經學的理解，但就其實際的人生經歷言，亦是得之於他為當時名將楊芳家的塾師（一八二二），為地方機構編纂鳳凰廳志與屯防志（一八二四），助賀長齡編纂皇朝經世文編（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六）與籌劃漕糧海運，以及數年擔任蘇撫江督陶澍的幕府（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五）。蓋館於楊芳家使其接觸武事，注意邊防及清代的武功。編地方志與皇朝經世文編，使其對經世致用思想的認識更為擴大加深，入陶澍幕使其直接參預各項政務，特別是河工、漕運、鹽政，自亦加深其對此類經濟實務的體認。根據他在皇朝經世文編五例中所言，我們可以了解，他的經世致用思想約略包含下列三項大準則：

一、注重實用與當代：他相信任何事物常是：「有利必有害，論相反者或適相成，視智亦見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sup>⑬</sup>。」因此注重實用，故說：「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紓途廣徑。」而且認定「時務莫切於當代，萬事莫備于六官<sup>⑭</sup>。」對於「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的，他均主張不予採行。由此已可看出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且在實用觀念上，極注重當代。為了瞭解當代，方及於歷朝。故在皇朝經世文編五例中又說：「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sup>⑮</sup>。」因此在時間順序的觀念上，他是要由近及古的，與當時一般人一意崇古有所不同。他所持的理由是：「然昨日之歷今日不可用，高曾祖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sup>⑯</sup>。」

二、注重德性與禮法：魏源相信，「法必本夫人」，而人之行為則在於心，在皇朝經世文編敍文中引用詩經說：「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及「周爰咨度，周爰咨謀」，來說明集思廣益與道問學的重要<sup>⑰</sup>，並認為學的目的是在致知；「知違從，知伍參變化」，「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

⑬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文海本，第一冊，頁五。

⑭ 同上註。

⑮ 同上書，頁七。

⑯ 同上書，頁一。

⑰ 同上註。

奚以齊且治平者也<sup>⑧</sup>。」於皇朝經世文編五例中說：「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原於吏，知治家卽治國，故宗法家教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禮<sup>⑨</sup>。」顯然他在經世致用的思想上，是與清初顧炎武等相近，是視道問學與尊德性爲其根本的，而德性與禮法又有不可分的關係。

三、注重時變，講求因時制宜與執兩用中；魏源在經世致用思想上既注重實用及當代，又相信任何事物皆是利弊兼具的，於是很自然的相信風俗時勢與世移易，今與古有不能強爲沿襲者，所以他說：「時易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爲藥石而今日爲筌蹄者，亦所勿取」<sup>⑩</sup>，對於一切措施，主張因時制宜，執兩用中，而且在決定是否爲因時制宜執兩用中時，應當集思廣益，多方考慮，俾能取其利而去其弊。他說：「是以保甲之難易，軍屯之碍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流則南北爭持，鹽課有歸商歸稅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異宜，議轉漕則殷運海運旁出，桑梓築堤，而謂宜去堤，吳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爲千古大利，而或極言其害，釀醋爲古今通禁，而或極陳其難，主擴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而廣益，庶執兩以用中，則取善之宜廣也<sup>⑪</sup>。」他認爲任何事物的演變，均當通其理，識其要，然後才能達到實用的價值，發揮執兩用中的功能，並舉例說：「蓋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穫春炊之節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脈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虛實補瀉之萬變，宜各通其要，不得謂一可類推也<sup>⑫</sup>。」且自以真儒期許，認爲祇有真儒，才能認識這種因時制宜，通變通要的道理<sup>⑬</sup>。

由於魏源在經世致用思想上注重通變與實用，故於當時的弊政河工漕運及鹽法皆有研究，除實際助賀長齡籌辦海運及陶澍改革漕鹽河三大政外，並於一八二五至二六年著籌漕上下篇，一八三二年著淮北票鹽記，一八三九年著籌鹾篇，一八四二年著籌河篇，一八四六年著錢漕更弊議等。按照他的看法，制度的改革可分爲因勢去弊變法二階段，亦卽先利用現有之條件，於制度內除弊，再進而變法，除弊之要則在儘其可能的化私爲公。他一再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主張追本溯源，變法宜民。嘗說：「夫推其本以齊

<sup>⑧</sup> 同上書，頁二。

<sup>⑨</sup> 同上書，頁六。

<sup>⑩</sup> 同上書，頁五。

<sup>⑪</sup> 同上書，頁五～六。

<sup>⑫</sup> 同上書，頁八。

<sup>⑬</sup> 同上註。

其末，君子窮原之學也。宜民者無迂途，實效者無虛議」<sup>⑭</sup>。

他的這種推本求原，注重事物制度演變歷程的觀念，不僅表現於經世致用思想上，亦用之於治學與治史，或者可以說他的在經世致用思想上的注重演變看法，仍是得之於治學，並因此而及於治史，在一八三二年以後，他治學注重易經老子及孫子，曾說：「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sup>⑮</sup>。」由於他注重老子，故對老子的物極必反之說，深信不疑。嘗說：「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消與長聚門，禍與福同根<sup>⑯</sup>。」顯然在哲學思想上有循環論的傾向。並且由這種循環論的看法，使他產生利弊合一，人心卽天心，天人合一，君道與師道合一的觀念。然而就另方面言，魏源的思想雖受老子循環論的影響殊深，但最後仍回返於儒家的觀念，其於默觚內集中，一再強調精誠專一，克己復禮，注重孝敬，虛己知足，寧靜致遠等等尊德性的儒家主張。並以仁來作為個人的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的德治間之經脈所在，他說：「因樹以為榮枯者華也，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樹以榮枯矣。因氣以為生死者身也，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氣以生死矣。性根於心，萌芽於意，枝分為念，鬯茂為情，則性之華也。……果復其核，情返乎性，核復生果，由一至萬，則果徧天下，眾善齊歸，而性大成矣。故曰天下歸仁焉！聖人以天下萬世為果，善人君子以一國數百年為果，眾人以一身一家為果<sup>⑰</sup>。」他更進一步的認為由仁而發展成的道德，是天下之大道，相信禮樂是道之器，兵刑是道之斷，食貨是道之資，治世是道形諸事<sup>⑱</sup>。故在根本上魏源憧憬德治與王道，視為是修齊治平的最高理想。

魏源雖注重德治，但他所謂的道德仍是要能驗諸治，符合實用與治世的原則的。曾說：「使其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家國，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因此他要求士人實事求是，「監觀四方，求民之莫」<sup>⑲</sup>。並認定人才的進用，當

⑭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三六四～三六五。

⑮ 同上文，頁三六七。

⑯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內集，卷二，頁十五下。

⑰ 同上書，內集，卷二，頁廿八。

⑱ 同上書，內集，卷二，頁十九下～廿一上。

⑲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二下～三上。

⑳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三上。

務取其大，不可計較其細節，而個人律己當以細行，不可有所疏忽。而且人的用世，當隨大隨小全力以赴，盡其己責<sup>①</sup>。相信才幹是來自於這種實事求是全力以赴的熱情與體認，故曰才生於情，未有無情而有才者，祇有小人才於國於君於民皆漠然無情<sup>②</sup>。

魏源於人才的崛起極為看重，嘗說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人才的崛起固在於能養才，亦在於識才。他相信人各有能有不能，承平直諒之士難盡責以臨危應變之才。有守不必有爲，有爲不皆有守，在上位者必須能知人善任<sup>③</sup>。對才與德的關係，相信不是完全融合的。有才之人不一定有德，有德之人亦不一定有才。他反對小人完全不可用之看法，認為天下小人不可盡誅，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祇可驅策於邊疆，而不可用於腹心密勿之地<sup>④</sup>。顯然他的尊德性已與儒家傳統的德重於才的說法，略有不同。

魏源在政治的最高目標上既憧憬德治與王道，很自然地他亦與當時一般士人相同，歌頌三代，視為聖王之世。但是另方面由於他注重當代，亦認為後世有勝於三代的，這就是劉廣京在其「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一文中所闡揚的，稱他有進化史觀的看法。魏源認為後世勝於三代者有三大端，一是廢肉刑，刑法由酷而仁，另外是世族變為貢舉及廢封建為郡縣，使用人由私而公。他認定這種後世好於古代的改變是有一項標準的，那就是便民。曾說「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又說：「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羣便者，變則不可復。」並舉例以為如租庸調變為兩稅，兩稅變為一條鞭，都是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雖聖王復作，均不可復。相信這種情形如同江河百源一趨於海，是無法再回頭的<sup>⑤</sup>。他的這種進化觀思想看起來與前述的循環論，似乎是有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蓋他的進化觀是指典章制度，而循環論則是指自然界的循環現象，與朝代政治的盛衰，以及人的際遇等。

魏源在經世致用的思想中，最為後人所知的，仍是他中進士（一八四五）前三年所著之海國圖志。魏源本人未曾親身參與鴉片戰爭，僅於一八四〇年英軍襲浙時，曾往寧波觀審英俘，及一八四一年短期入欽差大臣裕謙幕，於英軍退出定海時，隨軍前往辦理善後。旋以兵驕將怯，朝廷和戰不定，辭歸<sup>⑥</sup>。但他對鴉片輸入

①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三；頁四下。

②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一上。

③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卅一下；

④ 同上書，內集，卷三，頁廿五上。

⑤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三七四～三八五。

⑥ 王家儉，魏源年譜，頁七六。

所引起的社會經濟問題，及英人兇狠是均相當關懷與印象深刻的。故一八四一年於京口會晤貶赴伊犁效力的林則徐時，毅然接受林則徐的委託，利用林氏所集的四洲志澳門月報諸資料，編撰海國圖志。此書與他的聖武記均完成於一八四二年，亦即南京條約簽訂之年。在海國圖志的敍言中，他言明編撰此書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及「師夷長技以制夷」<sup>⑥7</sup>。故後人對他所提出的因應西人入侵的政策稱之為「以夷制夷」政策。魏源雖主張以夷制夷，但他始終認為：能否制夷，根本上仍在先平人心之積患，亦即內部的改革與振作是最重要的<sup>⑥8</sup>。故在思想上他的以夷制夷政策雖是有相當程度的縱橫家傾向，但安內重於攘外的根本看法，依然仍是儒家的。

他將海國圖志分為兩大部分，最大的篇幅是介紹各國的風土人情，亦即地誌部分，由南洋諸國與日本而及於西洋諸國。但最重要的部分，卻是他置於篇首的籌海篇以及置於最後敍述攻戰方法與西洋船堅炮利的部分。他認為自夷變以來，所使用的因應方法，「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按照他的看法，守最為重要。因為：「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sup>⑥9</sup>。故他的以夷攻夷是要以守為戰的。至於以夷款夷，亦是如此，他認為「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亦是能守方有談和的條件。由此可以看出，魏源以夷制夷的中心思想是建築在防守的基礎上。他所提出的防守方法是一，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二、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sup>⑦0</sup>。亦即將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諸人所使用的方法，作為是最有效的方法。而林氏等之所以採用如此的方法，主要是我國當時的水師力量薄弱，武器不如人，無英人的船堅炮利之利器，再加以綠營兵敗壞，與英人相戰每望風披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祇有如此。而魏源於鴉片戰爭結束時，仍持如此看法，顯然過於消極了，而且意味着他對清政府的改革絕望。蓋一般而言，我國如水師不如人，則當改革水師，購造遠洋艦炮，與西人在外海爭鋒；如陸軍不能戰，當改革陸軍，增強其戰鬪力，方是積極進取之道。如今一味退守規避，實非長治久安之善策。甚至就魏氏個人而言，與其素所主張之「因勢去弊變法」觀點，亦不脗合。

魏源在海國圖志籌海篇中，對於以夷攻夷亦提出兩項辦法，即：一、調夷之仇

⑥7 魏源，海國圖志，敍，頁一上。

⑥8 同上書，頁一下～二下。

⑥9 同上書，卷一，頁一上。

⑦0 同上註。

國以攻夷，二、師夷長技以制夷<sup>①</sup>。而所謂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實即利用敵人的敵人來攻打敵人，含有利用他人保護自己，或借力使力之意。所謂夷之仇國，此時期約包含兩種國家：一、西方諸國，二、中國藩屬。當時中國藩屬確是視西洋為仇敵，但無力量與西洋諸國相爭。而西洋諸國中與當時中國視為仇敵的英國間，亦是存在有矛盾，但此一矛盾並不能為中國所運用。故魏源的這一看法，可以說是紙上談兵，真正能實行的價值甚小。魏源之所以提出此一看法，仍是承接林則徐及其他鴉片戰爭時期人的觀念。倒是他的另一淵源於林則徐的看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確實具有因勢去弊變法精神，對後世影響極大。自強運動時代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大部分是根據魏源的此一主張。

魏源對於以夷款夷亦提出兩項辦法：一、聽互市各國以款夷，二、持鴉片初約以通市<sup>②</sup>。在根本觀念上，魏源是與鴉片戰爭時期多數國人看法相同，認定各國（包括西洋及中國藩屬）需要中國物產，必須與中國貿易，故中國可以貿易的方法控制之。在籌海篇議款中他譴責當時官吏的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的款夷，而主張多予互市各國貿易之利，盼英人因此覺悟用兵之失策，而能俯首聽命，或因此聯其所忌之國，居間折服調停，令其就我範圍<sup>③</sup>。故依然不出「利用他人，保護自己」的立意。至於持鴉片初約以通市，他希望對內嚴鴉片之禁，迫使英人與我國走向正規貿易的途徑，來解決雙方的紛爭<sup>④</sup>，顯然更是紙上談兵，對當時中英間的問題了解未深，而徒自一廂情願的幻想了！由此可以看出，魏源雖留心時事，自認為對當時的國際問題了解極深，但實際上由於他未參與外交實務，並不能完全認識真實情況。

此外在魏源的整個以夷制夷思想上，仍始終存在有中國是天朝上國，中華文化是高於西洋的觀念，其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固表現出中國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支配他國的思想，即使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又何嘗不是有中國文化優越，其所以要學習西洋的長技，亦不過是為制服西洋而已的意味。故魏源雖處於中國國力不如西洋的國際形勢中，但尚未真切了解到近代國際社會的意義，予各國以平等待遇。再則由魏源不願興辦遠洋海軍，亦可看出他對十九世紀中期海權時代來臨的意義，亦認識未深。因此我們可以說，魏源在經世致用思想上，仍是相當中國傳統的，他對新時代的來臨，認識並未十分真切，他的注重當代及變的思想是產生於治學及對道光時代

① 同上書，卷一，頁一下。

② 同上註。

③ 同上書，卷一，頁五七上～六三下。

④ 同上書，卷一，頁六一。

內政的感受，而非得之於西力的衝擊及對新時代的體認。

綜觀龔自珍與魏源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出，在鴉片戰爭的前後，亦即道光朝時期，當時時代新思潮約略具有下列的特徵：一、他們已認識了政治的由盛而衰，因而希望有所改革。二、他們經由這種認識，在思想理論上，產生注重變的觀念，認為改變是常道，祇有因時因地制宜的改變與革新，才能維持長久的盛世。三、在改革的基本思想上，他們本之於儒家傳統，注重德治與禮；在政治的理想上，仍以所謂的三代聖王之治為模倣對象。四、在改革的實務做法上，他們注重當代及實效，於是經濟之學與邊疆經營，成為他們注重的目標。綜括以上的這些特徵，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時代思潮仍是屬於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的。祇是在經世致用的觀念上，已產生了更以注重變與當代的含義而已！

#### 四、咸豐同治年間經世致用之學的發展

咸同年間由於中國正處於太平天國及挽回亂的亂世，故在經世致用思想上，與道光朝又有不同，極注重兵學與兵農合一的觀念。盛康在皇朝經世文續編的敍中，已明言道光以後是「逆患頻仍，歲祲屢告」的亂世，而且外侮內訌，禍變益亟，因此本於「殷憂所以啟聖，而師武臣力，亦因盤錯以激厲有成」囑其子盛宣懷編纂皇朝經世文續編一百二十卷，特重同治中興的勳業，戡定大亂的軍功。故較魏源所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兵政一項竟多出三卷。此時代的人注重軍事或兵政，不僅具有軍功平定太平天國諸亂事的勳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是如此，其他即如王韜羅澤南等，亦或以獻軍事奇策以干進，或團練鄉勇，親自征戰。曾國藩在致其季弟函中曾說：「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為第一義<sup>⑤</sup>。」顯然戰亂與清廷的號召士紳團練從軍，已使兵學成為此時期的顯學。根據蔡冠洛改編的清史列傳，咸同兩朝有傳者共一〇一人，其中被列入軍事類者（包括太平天國諸將，即該書所謂革命黨人），共四四人，佔總數四三·五六%，遠超出其他各類，充份反映出此是一軍事時代，注重兵學或軍政，或投袂從軍，已成為此二十餘年間的時尚。當時士大夫的理想是文武合一，允文允武，故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自序中說：「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sup>⑥</sup>。」曾國藩左宗棠等可視為具有此種理

⑤ 曾國藩，家書，卷七，頁三上。

⑥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文海本，頁四。

想的典型人物。曾國藩深通戚繼光兵法，用以創組並訓練湘軍。左宗棠研讀清代乾嘉以來用兵記載，亦深究戚繼光兵法<sup>⑦</sup>。他們鑒於經制兵八旗綠營的腐敗不能用，及本於兵農合一保衛鄉梓的觀念，支持清中期以來的傳統觀念以及林則徐魏源等看法，主張重用團練與鄉勇，招募壯健樸直農民為兵，求鄉紳士大夫中忠義樸誠之士為將，精誠團結萬眾一心的來保鄉衛國。曾國藩在致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說：「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共相衛。……但數十家聯為一氣，數百人合為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衛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耰鋤竹木皆為兵器<sup>⑧</sup>。」馮桂芬亦說：「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sup>⑨</sup>。」由於他們注重兵學，很自然地亦要講求火器，於是購用西洋槍炮及創建修械所，甚至機器局（兵工廠），以至於僱用洋兵洋將，使經世致用的傳統思想與應變圖新現代化觀念相結合，並由此而產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價值觀念。

咸同年間在經世致用思想上第二項極為突出的，是注重經濟與財政。由於處於亂世，使此時期士大夫要探討造成動亂的原因，汪士鐸已直覺的了解太平天國的動亂，與人口過剩有關，為此他提出節育的看法。祇是由於根深柢固的男性為中心的思想，使他所主張的節育是貧困之家不可以生育女兒，希望經由對婦女人口的控制，而達到人口不快速增加的目的<sup>⑩</sup>。盛宣懷於編纂皇朝經世文續編中，特選輯吳鉉的因時論九，作為戶政的篇首。認為「富之所在，勢爭歸焉，勢之所歸，民爭趨焉，天下之人皆去廉恥而就富利」，故「一家富而一家治，一國富而一國治，天下無一人不富而天下治」，「財不足，則貧者不能為生，富者不可以久，匹夫匹婦皆得挾厚貲以與王公大人爭勝，故得勢益彰，失勢則無所不至<sup>⑪</sup>。」相信貧窮是造成風俗敗壞，天下動亂的原因，因而要求富，希望能藏富於民<sup>⑫</sup>。

但如何能藏富於民，在觀念上他們並未接受西洋思想，從事重商，反而是仍回歸到傳統儒家思想上，要重農桑、禁奢侈、行儉樸，以義為利。為此皇朝經世文續編中，選錄徐鼒的務本論，楊象濟的裕財策，湯鵬的醫貧諸文。甚至如馮桂芬曾國藩左宗棠諸人，或久居上海，通曉夷務、或主持軍政大計，與洋人有所往來，他們

⑦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二三～四二四。

⑧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海本，書札，卷二，頁四上。

⑨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文海本，頁三～四。

⑩ 汪士鐸，乙丙日記，明齋叢刻本，卷二，頁二十。

⑪ 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文海本，第廿九冊，頁二九七二～二九七三，吳鉉，因時論九。

⑫ 同上書，第廿九冊，頁二九七五～二九七六，吳鉉，前因時論十六。

在思想上仍未了解重商與富國富民的關係，馮桂芬曾說：「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踰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sup>⑬</sup>。」曾國藩雖在文字上未曾有重農抑商之論，但由其一生崇實務儉自恃，告誡諸弟諸子要耕讀並重，時時學習插田蒔禾等事，甚至拾柴收糞諸事亦當爲之<sup>⑭</sup>，可知亦是認爲務農是齊家治國的根本的。左宗棠更是如此，他一生始終是重農主義者，認定爲政在紓解民困，注重農事。爲此並曾著廣區田制圖說，親身加以實驗，主張士紳必須務農<sup>⑮</sup>。僅商人出身者鄭觀應持相異的看法。由此或可了解，這種以農爲本的儒家傳統思想，才是使此時期中國雖然與西方列強有較深的接觸，了解西方之強亦在於重商，但始終在經世致用的思想上，絕大多數的士大夫未曾考慮以重商作爲富國富民的途徑。但是另方面由於厘捐與籌餉的關係，他們（左宗棠除外）究竟與傳統思想略有不同，似無抑商的意圖。故不重商雖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有所延緩，但亦未曾因此有所斲斷。

關於財政，咸同年間士大夫在認知上存在有一種矛盾，根據儒家的觀念，他們一面認定國用當儉、賦稅當輕、爲君主者不當用聚斂之臣毒痛天下，一面卻又承認當此軍務叢興之際，必須籌措巨額款項，以供軍需。兩者間如何調和，實是極爲困難之事。馮桂芬在其校邠廬抗議中提出六項辦法：一、推廣蠶桑茶礦之利，二、撙節不必要的開支，三、裁減經制兵額，四、通貨用錢而不廢銀，五、清除賦稅積弊，六、墾荒。就第一項言，他的著眼點既在中外貿易之利，亦在栽桑樹茶，以爲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善政。曾說：「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爲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爲大宗。彼以鴉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鴉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對於開礦，他則視爲是開發地利，我不行之，必爲洋人所攫取<sup>⑯</sup>。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推廣蠶桑及茶之利，立意並不在重商，僅是認爲中外通商之局既不可改，倒不如趁此洋人所需，廣植以收其利。是要以中國農產品換取洋人之利，絕無發展商業與洋人一爭長短之心。由於馮氏的這種籌國用的辦法是與傳統思想相符（開礦除外），當時絕大多數的士人亦多持有相似的看法，而同光年間各省疆臣更常是如此推行，使我國蠶桑及茶之利較前更爲興盛。

至於撙節不必要的開支與裁減經制兵額，馮桂芬的著眼點均在淘汰冗員，特別是游手好閒的滿人與不能作戰的綠營兵。他說：「國家經費有常，惟宗祿無定額，

⑬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九一～九二。

⑭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四，頁四一下；卷六，頁三十上。

⑮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二〇～四二一。

⑯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九十九～九四，籌國用議。

……近來歲支三百餘萬，十倍於國初，……至八旗生齒日繁，世復一世，尤難億計」<sup>⑦</sup>。對於經制兵額，他認為三四十萬足夠，其不能任緝捕及防守者應全予淘汰<sup>⑧</sup>。他也持道光以來士人的共同看法，應重用勇營，俾兵農合一。馮桂芬的這項主張，可以說是多數漢籍士大夫的心聲，唯多不敢表露，以搜滿人之怒。而同治年間曾國藩劉坤一諸湘軍將領以勇營收標的辦法補入綠營，其目的亦正在此<sup>⑨</sup>。

關於通貨用錢而不廢銀，可說是道光以來留心經世致用士人的通識，他們目睹當時金融現象銀日貴錢日賤，認定是銀漏於外洋的結果，故倡議改革幣制，重用制錢，作為主要的通行貨幣。唯由於制錢單位太低，無法因應大宗款項的交易，故有用錢而不廢銀之說<sup>⑩</sup>。所言雖不合貨幣理論，但一時持此議者極眾，皇朝經世文續編中，湯成烈即有相同主張。唯湯氏主張用官府力量規定白銀兌換制錢的價格<sup>⑪</sup>。

墾荒亦是此時期甚多士人的共同看法，馮桂芬著眼於戰亂使江南人口銳減，田地荒蕪，移民墾荒，可增加生產，復甦經濟。尤難能可貴者，他主張用西洋火輪機開墾<sup>⑫</sup>。而湯成烈吳鋌等則主張於西北興水利，以置內地閒散人口。墾荒雖能解決過剩人口，唯究於當時籌措國用有多少助益，特別是咸同戰亂之際，是頗令人懷疑的。倒是太平天國平定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丁日昌等用此策，招徠客民，開墾戰亂之區荒蕪田地，於此等地區經濟之復甦，大有助益。

關於清除賦稅積弊，這是清代歷朝士人的一致要求，大多將注意力集中於地丁及鹽課上，而其辦法不外免除中飽，征錢征糧應以便民為主，查漏逃稅，均賦及清丈土地，使賦稅的負擔公平合理，以及鹽務的引岸或票引制度的改進等。馮桂芬在此方面提出創新的建議處不多，唯一值得注意的，他主張罷除關征，認為關稅的中飽較田賦尤甚，「田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之所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與其征關稅招關蠹，則不如盡廢關征，將關稅併厘捐之中，責成地方官會同紳董治之，弊端較少。他認定農心齊而商心不齊，業農者不可他適他徙，業商者則否，農不能增其穫以償賦，商能增其價以償稅，所以田賦如要

⑦ 同上書，頁九四～九五。

⑧ 同上書，頁一四二～一四三。

⑨ 當時將勇營收標補入綠營，使綠營兵力及戰鬪力增強情況，可參閱拙著，「同治中興時期劉坤一在江西巡撫任內的表現」一文，師大歷史學報，第一期，民六十二年，頁二五四～二五六。

⑩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一七〇～一八〇。

⑪ 皇朝經世文續編，文海本，第卅冊，頁三五四五～三五六〇。

⑫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一九八～一九九。

浮收多收，則將激成叛亂，而厘捐則不然<sup>⑧</sup>，故持此一主張。咸豐初年雷以誠創行厘金制度以濟軍餉，之所以能於短期即為各省採行，固由於方法簡便，易於籌款，就另方面言，亦未始不是由於這種看法。而這種看法的本身又是一種重農抑商思想的反應。因此我們可以說，咸同年間在經濟財政思想上所表現的經世致用觀念，仍是未曾脫離傳統的。唯由於此時期大宗稅收厘金及關稅均是一種商業稅，政府財稅結構既於此時期逐漸依重商業稅，於是注重貿易及商業的情勢已在形成之中，致而亦伏下日後在經濟思想上重商的契機。

咸同年間在經世致用思想第三項甚為突出的，是利用宗族制度來移風化俗維持社會安寧的思想甚為流行。清代社會以士紳及宗族制度為骨幹，而士紳與宗族每又有不可分的關係。蓋士紳是宗族團聚的核心，宗族則是士紳執行其鄉治的後盾。不少強宗之所以能維持其在社會優勢的影響力，主要仍靠培育子弟，博取科舉功名，成為士紳，躋身入地方領導階層。故士紳與宗族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太平天國既要打倒士紳的領導地位，亦要摧毀中國社會的宗族家庭制度，將整個社會結構加以改造。致而曾國藩所倡導的士紳衛道抗太平天國運動，自然而然地亦要利用宗族的血緣組織，來團聚其保鄉衛國的力量。湘軍的組成顯然即是利用我國社會中的這種鄉里宗黨關係。左宗棠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天下將大亂時，亦曾與郭嵩燾欲利用宗族組織，舉族移居深山交通閉塞處，以求獨善其族的世外桃源生活<sup>⑨</sup>。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著復宗法議，於宗族制度對政教的關係，闡釋極為透徹，他說：「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為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為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他亦注意到士紳與宗族的關係，他說：「族正以貴貴為主，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為主，皆由合族公舉。」他將一切教養及社會福利事務歸之於宗族，認為宗族制度完善，可盜賊不作，邪教不興，爭訟械鬭之事絕跡，常則社會易於醇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而且利用宗族制度作政教之基礎，是符合大學修齊治平的道理的<sup>⑩</sup>。皇朝

⑧ 同上書，頁八五～九十。

⑨ 抽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一七。

⑩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一一一～一一七。

經世文續編中輯有瞿家鑒復小宗倫一文，亦有類似看法。這種注重宗族制度思想的盛行，自然亦反映出在這軍務孔亟的亂世，他們所主張的經世致用思想，是要尊德性的，曾國藩在其求闕齋日記類鈔中曾說：「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sup>85</sup>。」皇朝經世文續編中並選輯保守之理學家倭仁的看法：「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sup>86</sup>。」重德性不僅是曾國藩練湘軍選將的標準，顯然亦是當時政府用人的準則。由此可以了解，咸同年間的經世致用思想，仍是以注重傳統道德爲根本，未曾跳出儒家德治的範圍的。於是在這種維護傳統的大觀念下，我們所看到的太平天國亂事平定後的一切善後措施，均是以恢復傳統的舊秩序爲準則，除軍事的採用西技外，殊少具有創意及符合近代化要求的革新！

至於清代以來經世致用思想上的另一要項——道問學，咸同年間所表現的情狀，則與前者略有不同，那就是他們本之於道光時代龔自珍與魏源等所主張的，要因時制宜，法後王，注重當代。曾國藩曾說：「天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sup>87</sup>。」馮桂芬亦說：「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sup>88</sup>。」而李鴻章更是如此，於同治初年嘗表示：「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祖宗之成法<sup>89</sup>。」而且他們不僅注重當代，更要注重有實用的功能，甚至祇要有益於當代及實用，即使以夷說爲師，亦未嘗不可。馮桂芬曾說：「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sup>90</sup>。」李鴻章自同治元年率軍抵上海後，即始終主張師夷之長技，用夷變夏<sup>91</sup>。

<sup>85</sup>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二下。

<sup>86</sup> 皇朝經世文續編，文海本，第一冊，頁一四五。

<sup>87</sup>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十。

<sup>88</sup>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六～七。

<sup>89</sup> 李鴻章於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致陳筱舫侍郎，曾說：「兵制關立國之基本，馭夷之樞紐，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祖宗之成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頁三四）。

<sup>90</sup>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文海本，頁七。

<sup>91</sup> 如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函復李獻堂稱，「復不得已，舍陸登舟，用夷變夏。」（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頁九下。）十二月十五日亦上曾國藩稱：「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頁四七上）。

故這種經世致用思想上道問學的結果，才會產生應變圖新的新觀念，而於師夷長技爲主的自強運動，有所促成。咸同年間的士大夫對於道光時代龔自珍與魏源等人所言的變，觀念上不盡相同。道光時代士大夫的變局觀念，主要來自於對當時軍務廢弛，政治腐敗的覺識，以及受易經及公羊學觀念的影響。因此他們要注重邊疆經營，及吏治財政經濟等制度上的改革，可以說是在變局或亂世未成之先對世局將變的警覺，而且這種警覺主要是因中國內部問題而產生。咸同之世則不然，此時期無論就中國本身內部言，或就外在西力衝擊言，均是變局已成，而且他們認定這種變局的造成，無論是太平天國之亂，或列強的侵略，主要仍在於西力的衝擊，因此才能從經世致用的傳統觀念中，產生應變圖新的新思想。李鴻章可作爲此種新思想的代表者。由於這是一種新思想，故不擬於此討論，將另爲專文詳述。

最足代表咸同年間思潮的重要人物，則有曾國藩與左宗棠。曾國藩（一八一—至一八七二）湖南湘鄉人，出身於耕讀並重的士人家庭。父祖兩代崇儉務實，誠正待人。父曾竹亭館於鄉里，應童子試十六次不第，年四十二方中秀才，（早於國藩中秀才一年）可謂是積苦力學的老塾師。國藩少從父讀書至十九歲。八歲時讀畢五經，十五歲時學周禮儀禮及史記文選，略奠定其一生學問初基。由於性耽遊惰，喜與裘馬少年相逐，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二十二歲時方中秀才，此後覺悟前非，故自號滌生，折節讀書，並時刻以克紹儉樸務實家風爲訓誠<sup>⑨3</sup>。於次年中舉。道光十五年會試不第留京讀書，研讀經史，尤好韓愈古文，自此乃漸以古文詞知名。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從此步入仕宦坦途，於丁母憂在湘辦理團練前，歷官四川鄉試正考官（一八四三）、詹事府右春坊左右庶子（一八四五）、翰林院侍講學士（一八四五）、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一八四七）、禮部右侍郎（一八四九）、署兵部左侍郎（一八四九）、署工部左侍郎（一八五〇）、署刑部右侍郎（一八五一）、順天府鄉試正考官（一八五一）、署吏部左侍郎（一八五二）、江西鄉試正考官（一八五二），行政經驗極爲豐富，而且由於出身農村，又曾與裘馬少年相逐，社會經驗亦豐，於民間艱苦知之甚深，及任翰林院庶吉士後，留心世事政務，立意效法前賢，有激清天下之志。而其行爲恭謙儉樸內斂，處事精細篤實，知人善任，故日後能成平定太平天國之勳業。

國藩於經世致用思想上，首重尊德性，其個人自奉儉約，生活規律，諸事持之以恆，好學不倦，每日清晨起讀，中夜方休，即使在軍中亦復如是。自訂課心課身

<sup>⑨3</sup> 曾國藩何時起改變其浪蕩之行爲，折節向學，年譜及傳記中均未明載，唯就其事蹟觀之，當在中秀才時期，故文中作此定年。

之法爲：敬恕誠靜勤潤六字<sup>④</sup>。對大學一書中所主張之修齊治平之說，終生服膺，嘗於致弟家書中說：「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旣自名爲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sup>⑤</sup>。」故於儒家的理想內聖外王之說，亦視爲是君子立志的境界，曾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不愧爲天地之完人<sup>⑥</sup>。」氏極看重德治，認爲風氣端正與否，全在爲人上者，是否可爲表率，要求領導階層注重修身，以忠誠爲天下倡。在湘鄉昭忠祠記中曾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呴，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憚，由是眾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耻<sup>⑦</sup>。」而他的所謂德治，除去急公好義以忠誠爲天下倡而外，亦在於心存仁禮，嘗說：「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矣。」又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sup>⑧</sup>。」故誠敬篤行與克己復禮是曾國藩所主張德治的內在要求，而民胞物與及成王道之業是他德治的外在目標，這一切整個基礎仍在於孔子所主張的仁恕之道與推己及人。

在道問學方面，國藩少年時代所學的四書五經及周禮儀禮及史記等，對他畢生有決定性之影響，此於前述的尊德性中已可明顯看出。此外氏於廿三歲（一八三四）時，就學嶽麓書院。嶽麓書院爲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理學家朱熹張南軒皆曾在此講學，素有理學傳統。日後國藩喜好理學，似與此有關。入京以後，與劉蓉郭嵩燾等爲友，從唐鑑講求爲學之方。唐鏡海以理學名於世，故勗以義理之學，以朱子全書爲宗。國藩遂以朱子之書爲日課，肆力於程朱理學，並與倭仁吳廷棟何桂珍邵懿辰等往復討論。氏一生服膺篤行，顯然受朱熹格物致知之說影響。國藩治學雖宗理學，但於詞章，漢學並不排斥，曾說：「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

④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海本，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十八下。

⑤ 轉引自何貽焜編，曾國藩評傳，正中，民四十二年，頁六七。

⑥ 同上註。

⑦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四，頁十八下至十九上。

⑧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六一下。

也<sup>⑨</sup>。」又說：「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四者闕一不可。……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鵠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sup>⑩</sup>！」

在治學方法上，國藩秉持顧炎武以來的清代學者觀念，視小學爲通究古書的工具，曾說：「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sup>⑪</sup>。」而欲治小學，並須於形聲義三方面兼顧。氏於小學甚有心得，曾著詁訓雜記，根據說文等訓詁的方法，認爲大學所言之致知在格物，其立意在：「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相信朱熹將格字作至字解，甚爲正確，但引深至「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對格字要求又嫌太深<sup>⑫</sup>。顯然他終生處事篤行重實踐，固然與其湖南務農性格有關，但另方面亦是受其長於漢學及深究朱熹格物致知的影響。

除小學外國藩治學亦注重目錄學，認爲目錄學之功用在分別部居，以類相從。氏將我國目錄學的分類方法概分爲虛事與實事兩大類：「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鑒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並欲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sup>⑬</sup>。由此亦可看出其治學與處事相同，極爲精細，井然有序。

另一在治學方法上值得注意者，國藩讀書不主龐雜，而主守約守要，他曾說：「鄙人嘗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鶻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剽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眾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sup>⑭</sup>。」在聖哲畫像記中他亦說：「故書籍之浩浩，著述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

⑨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下。

⑩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八。

⑪ 同上書，家訓，卷上，頁卅六下。

⑫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正中，頁二二〇～二二二。

⑬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上，頁卅三～卅四上；何貽焜，曾國藩評傳，正中，頁二一八～二一九。

⑭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十一，頁十六下，覆李希菴。

擇焉而已。」於是他爲其子紀澤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莊子、司馬遷、班固、諸葛亮、陸贊、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頤、程灝、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東坡、黃庭堅、許慎、鄭康成、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認爲可以師法<sup>10</sup>。由這三十三人包括經史子集或義理、考據、詞章，或德行政事文學語言學各方面，我們可知曾國藩雖主讀書簡約守要，但所轄範圍，仍是甚爲完備的。

聖哲畫像記成文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此文不僅表露曾氏心目中所崇拜的先聖先賢，亦是他對自古迄清我國學術思想發展的闡述與批評。由此文的內容，我們可以了解曾氏在學術思想上的認知：

一、以儒家孔孟思想爲正統，文中非儒家者，僅莊子一人，其他老子韓非墨子均未列入，而且在儒家思想中僅重孔孟，其他曾子荀子亦未列入。他在文中特別說明唐宋以後，尊崇孟子，「崇其書以配論語」是對的。

二、相信爲學之道總以義理德行爲主，所選三十三人中，屬於此方面的，至少有：文周孔孟諸葛陸范司馬周二程朱張顧秦十五人，佔總數達四五·四五%。其次則爲辭章文學，計九人，佔二七·二七%。

三、尊崇理學，唯不排斥漢學：文中屬理學者，有兩宋五子，而屬漢學者僅許慎、鄭康成、王念孫三人，並稱：「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四、不宗法公羊思想：在春秋三傳中，曾氏僅選左傳，未曾選錄公羊。顯然與道光時代龔自珍魏源看法不同。而且他欣賞左傳的原因，是在於「多述二周典禮」，仍認爲有「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的缺點。

五、崇尚禮治：文中說：「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他認爲漢儒及杜佑通典宋儒張朱所討論的都是禮治問題，清代顧炎武張蒿菴江慎修戴東原等也是以禮爲先務。他之所以選入秦蕙田的原因，也是因爲秦氏纂有五禮通考。並且肯定表示，此書的貢獻在於：「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

六、偏愛莊子：非僅非儒家諸子中僅選莊子，而且他是認定莊子是與荀子並稱於世的。並爲莊子辯護稱：「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

<sup>10</sup> 同上書，文集，卷三，頁廿二上～廿七上。

亦居十之六七。」國藩的一生在修養功夫上，甚多得之於莊子。他在求闕齋日記中曾說：「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sup>⑩</sup>。」因此他一生不汲汲於赫赫之功，總是萬事處之以恆，長年累月，終成不世勳業。他對莊子觀化，是有深刻理解的。此外他的主靜主虛，以及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無一不是受莊子影響。曾說：「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sup>⑪</sup>。」又說：「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壞也，乃所以爲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sup>⑫</sup>。」「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眞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所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sup>⑬</sup>。」祇是他畢竟是事功型人物，具有強烈的儒家入世精神，故而他的主靜主虛主放大胸懷，最後仍回返到儒家所主張的正心誠意立志修齊治平上去。他說：「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sup>⑭</sup>！」

曾國藩由於治學注重易經宋儒及莊子，很自然地他對事物亦有循環論的看法。在求闕齋記一文中曾說：「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sup>⑮</sup>。」因此他對禍福相依，盈虧相繼，心中時刻存有戒心，爲人處世要清心寡欲，慎獨誠敬謙沖，對其家人亦一再訓誠當勤儉樸實；不可驕奢惡勞。甚至爲此而名其居曰求闕齋。但他的這種循環論的看法究竟與龔自珍魏

⑩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七下。

⑪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二上。

⑫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四。

⑬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四下～五下。

⑭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十六。

⑮ 同上書，文集，卷一，頁卅二上。

源不同，未進一步發展成以變為理論基礎的政治改革思想。曾國藩所希冀的改革，是逐步的改進，而非激烈的劇變。

在各項學問之中，除四書外，曾國藩最致力的，首推經學，他認為讀經的目的在能窮理。在致邵子進函中，曾分述讀六經的益處：「六經義精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熟讀詩經，自足使人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人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人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心思識趣覽有把握<sup>⑩</sup>。」在諸經之中，易經與禮經對他影響最深，所著求闕齋讀書錄，首先就討論此兩著作。概括言之，他的主張莊敬，推誠守正，以及循環論的看法，亦是相當的受易經影響。曾說：「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睽：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sup>⑪</sup>。」

對於禮經，國藩素認為是經綸萬物，化民成俗的最佳工具，一生所受影響最深，亦研究——特別是儀禮——最有心得。他相信禮既可自治，亦可治人，是修己治人的要道<sup>⑫</sup>，不僅他個人的恭謙誠敬行為是受治禮經的影響，即日後在政治上推行的禮治，亦淵源於此。他同意秦蕙田等的看法，禮是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於一的經典。曾說：「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sup>⑬</sup>。」由此可以了解，曾氏甚至是視禮經為通古今之變的萬靈丹。

國藩既是注重事功又好學不倦的士人，很自然地在道問學上，他注重讀史，在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三）十二月致弟書中曾說，他每日必讀史著十葉<sup>⑭</sup>。而認為讀史的方法莫過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sup>⑮</sup>。」他相信史學的最大功用在考事，與經學的窮理，有相輔相成的關係，甚至說：「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在讀經上他主張專守一經，因此沉潛於禮

<sup>⑩</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三十，頁十九下。

<sup>⑪</sup> 同上書，求闕齋讀書錄，卷一，頁一。

<sup>⑫</sup>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廿二下。

<sup>⑬</sup> 同上書，書札，卷十三，頁三下。

<sup>⑭</sup> 同上書，家書，卷一，頁四十下；四三下。

<sup>⑮</sup> 同上書，家書，卷一，頁四八上。

經，在治史上則主張專熟一代，因此喜好史記漢書<sup>⑩</sup>，在咸豐九年家訓中，認為是十餘年來，除四書五經而外，最愛讀的四種書中的兩種<sup>⑪</sup>。他對讀經與治史看法相同，均注重於義理。於史記及漢書，則認為司馬遷才華遠高於班固，但史記是有所為而作，其中寓言及借題發揮處甚多。因此他在求闕齋讀書錄中，雖有三、四兩卷討論史記與漢書，而最推崇的卻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注重資治通鑑的原因，在於有道德史觀以及鑑往知來的效用，曾說：「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敍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恍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sup>⑫</sup>。」此外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及杜佑通典亦甚推崇，認為是具有周覽經世之大法的。對鄭樵的通志，則不甚贊成<sup>⑬</sup>。

除史學而外，曾國藩亦如道光朝的學者，長於兵學及地理學。在兵學方面，他除根據戚繼光兵法編練湘軍外，認為帶兵之道如同治國與齊家，在於勤恕廉明，其中勤字最為緊要。曾說：「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為要<sup>⑭</sup>。」所謂恕，按照他的看法，即是用仁，根據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觀念，待兵勇如子弟；而廉明即是用禮，亦即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sup>⑮</sup>。顯然他是活用孔孟所講的仁與禮於兵學之中。這是他治兵學的心得，也是他帶軍最為成功，且與其他兵家不同之處。就另方面而言，他目睹太平軍以宗教信仰作為思想教育，使土卒視死如歸，而為對抗起見，力創以儒家思想及衛道精神，予湘軍以嚴格思想訓練，又何嘗不是將儒家思想，用之於兵學。故曾國藩在兵學上的成就，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在練兵及作戰方法上，曾國藩洞識清季經制兵之弊在互相妒功嫉能，懦於遇賊，勇於擾民，故其練勇著重精誠團結，能死守，有堅忍不拔之意志，其口號曰「我不能戰，但毋走。」在致王鑫函中稱：「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

⑩ 同上書，家訓，卷上，頁十三下。

⑪ 同上書，家訓，卷上，頁十三下。

⑫ 同上書，書札，卷六，頁卅一上。

⑬ 同上書，文集，卷三，頁二四下。

⑭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九上。

⑮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六一。

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補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sup>⑩</sup>。」在致文任吾函中亦說：「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sup>⑪</sup>。」爲使軍隊能死守，他極講求深溝高壘之術，及訓練湘軍站牆子與小單位作戰<sup>⑫</sup>。務使其軍能步步爲營，穩紮穩打。故終能制驃悍快捷遲堅搗虛之太平軍於死命。因此我們可以說，國藩在練兵與作戰方法上，如同其爲人，得要訣於穩實二字。

地理學方面，國藩既注重用兵，於是所到之處，亦留心地理。其所著求闕齋日記類鈔中，有游覽一章，記載各地情況逾百條，其絕大多數均言山川形勢與交通情況，以及古今變遷。而真正言及風景者不過極其少數幾條而已。如記載直隸獻縣子牙河稱：「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流後，即謂之子牙河<sup>⑬</sup>。」幾乎全有關地理形勢者，毫無游覽之意，其他亦皆類此。

曾國藩是以聖哲爲模倣對象的人，故其尊德性與道問學的最後目標仍在於匡世濟民，他認爲咸同時代所以形成天下大亂的原因，不外有三：

一、居高位的怠惰：在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治道」中，舉隋煬帝及唐明皇爲例，認爲：「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又說：「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閣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慎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sup>⑭</sup>。」其後復舉匡衡抑陳湯，宋璟抑郝靈荃之例，來說明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sup>⑮</sup>。他雖不敢論列清代的實況，但由此已可知其看法矣！

二、吏治的貪虐與是非不明：在咸豐帝初卽位應詔陳言疏中，他說：「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頽<sup>⑯</sup>。」在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中說：「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啄息，怒喜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在覆胡蓮舫函中說，「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

<sup>⑩</sup> 同上書，書札，卷二，頁卅一下。

<sup>⑪</sup> 同上書，書札，卷二，頁卅五下。

<sup>⑫</sup> 可參閱王爾敏，淮軍志，中研院近史所，民五十六年，頁八三、八五。

<sup>⑬</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下，頁四四下。

<sup>⑭</sup>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四九上。

<sup>⑮</sup> 同上註。

<sup>⑯</sup> 同上書，奏稿，卷一，頁七下～八上。

……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在覆左宗棠函中亦說，「捻匪氣燄日壯，論者以爲禍烈於洪楊。山東河南兩省大府不講吏治，從亂之民日多。」在致吳甄甫制軍函中更說：「今日天下之變，祇爲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賢人撫膺短氣，奸滑機巧消遙自得<sup>⑩</sup>。」在求闕齋日記類鈔治道中記載官吏貪墨說：「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sup>⑪</sup>。」均在言明當時吏治的貪虐顛頽，致而是非不明。

三、人心貪欲，風俗丕變：國藩對於當時人心，特別是士人之貪鄙，風俗的澆薄，是深惡痛絕的。在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中說：「今世之士，自束髮受書，即以干祿爲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徼福祿利無盡境，則干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sup>⑫</sup>。」在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中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降其好勝之私<sup>⑬</sup>。」在彭母曾孺人墓志銘中亦說：「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昔我少時，鄉里家給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彊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sup>⑭</sup>。」在復彭麗生函中，更明白指出：「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融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驟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sup>⑮</sup>。」在與魁蔭亭太守函中亦說：「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爲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刦掠都市，視長官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sup>⑯</sup>。」

曾國藩既對時局持如此看法，故認爲匡正時局的根本之圖，在扶持名教，崇尚禮治。於討粵匪檄文中說：「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

<sup>⑩</sup> 轉引自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三一八～三一九。

<sup>⑪</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一。

<sup>⑫</sup> 同上書，文集，卷一，頁六下～七上。

<sup>⑬</sup> 同上書，文集，卷二，頁四下。

<sup>⑭</sup> 同上書，文集，卷一，頁十二上。

<sup>⑮</sup> 同上書，書札，卷二，頁五。

<sup>⑯</sup> 同上書，書札，卷二，頁十。

……舉中國數千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sup>◎</sup>。」在所著禮一文中，國藩曾將禮治的意義，有所說明，他說：「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體國經野門，於著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sup>◎</sup>。」他希望透過扶持名教與禮治的推行，人人能安份守己，進而化民成俗，天下成治。而這種扶持名教與禮治推行的責任，則在於讀書的士人與地方的縉紳以及負行政之責的官員。由於士人與官吏隨時均可變爲縉紳，因此他的扶持名教與推行禮治，實際上是建築在士紳基礎上的，與紳治有不可分的關係，亦可稱之爲紳治。當然此處所謂的紳，是指良紳，而非惡紳。他曾說：「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他要用孝友睦姻任卹之士紳，亦即有六行的士紳，來化「一方之莠民」，使「正氣漸伸，奸宄因而歛迹」，「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鶴巢不逐而自逃<sup>◎</sup>。」他於咸豐三年在湖南號召士紳起而共組團練，隨他力抗太平軍，顯然用心亦在扶持名教，保鄉衛國。曾氏要求士紳具有下列四項特質：

一、保愚懦以庇鄉：國藩目睹太平天國之亂期間，惡紳每假籌辦團練，或捐輸支應官軍，肯勤鄉里，欺壓良民。因此盼良紳挺身而出，真正能保愚懦以庇鄉。

二、崇廉讓以奉公：士紳團練籌餉，每因此而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不已，因此他希望良紳出而廉潔奉公，互相推讓，不爭權奪利。如此在人民間才能獲得尊崇，視爲親上，具有強大影響力。

三、禁大言以務實：國藩認爲當時書生的最大缺點是：好攻人之短，輕詆大賢，苛責時彥，好談兵事。因此要求士紳能爲務實之學，不輕言兵，不道人短。

四、擴才識以待用：國藩引淮南子「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仲舒：「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及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說

<sup>◎</sup> 同上書，文集，卷三，頁一。

<sup>◎</sup> 同上書，雜著，卷二，頁一，筆記廿七則，禮。

<sup>◎</sup> 同上書，雜著，卷四，頁十五下～十六下。

法，要求士紳力學增廣才識以濟用。他反對士人的過份干進，故曰以待用<sup>⑩</sup>。

曾國藩對任用士紳，主待之以禮，獎多於懲，必要時更可以名利相誘，唯不可說破。在致弟國荃信中說：「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則痛譽之，見一不善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sup>⑪</sup>。」在日記中亦說：「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sup>⑫</sup>。」但對行為素劣的惡紳，他亦主張加以懲處，俾收立威及儆尤之效。唯在根本上，國藩是以仁禮善待士紳的。如眾所知，他不僅於湘軍軍官起用有忠義之氣，無不良惡習，任務實的年青力壯士紳；甚至於理財籌措軍餉上，亦用士紳辦理厘金。他之所以如此重用士紳，固與其扶持名教及推行禮治之政治主張有關，另方面亦因此類士紳大多負有理想抱負，並無官僚惡習；此外如此措施尚可獲得美譽與社會領導階層支持。故當時不少疆圻大吏，如沈葆楨蔣益澧劉坤一劉銘傳等，亦皆採用此種治術。紳治可以說是咸同年間，甚至光緒時期，內政上的一種特色。清廷為平定太平天國等亂事，必須重用士紳團練籌餉，保鄉衛國，在根本上已造成官必須與紳合作，何況曾氏或其他漢籍官員，他們本身即屬於士紳階層，無論在看法上，或利益上，與士紳亦相融合。我們可以說，咸同年間是官紳合作無間時代，此時期官與紳之所以能合作無間，就根本而言，是因太平天國既反對官——清政府，亦反對紳——社會的領導階層，於是外在的形勢，迫使官紳必須合作。另方面清政府的及時覺悟，而肯予士紳較多權力，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曾國藩的紳治顯然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而產生的。但極值得注意的是：他將這種紳治予以理論化，而提出扶持名教與禮治的口號，顯然在此點上較林則徐魏源的政治看法要高出甚多。

曾國藩在政治思想上另一項重要的特徵，是注重人治。既注重人治，因此首先盼望在高位者能以本人的道德修養來為屬下的表率，俾能收潛移默化之效。在求闕齋日記類鈔治道一章中曾說：「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sup>⑬</sup>。」在原才一文亦說：「風俗之厚薄奚

⑩ 同上書，雜著，卷三，頁十一下～十三上，勸誠紳士四條。

⑪ 同上書，家書，卷五，頁四三上，咸豐七年正月廿六日。

⑫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十下。

⑬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二下。

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sup>⑯</sup>。」由此可以看出，曾氏是極端注重政治及社會的領導人物，他是相信祇要有好的領導人物，透過彼等的風範與感化，自然可以達到成治的目的。所以對領導人物的要求，是君道與師道合而為一的。曾說：「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諸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為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sup>⑰</sup>。」

曾國藩既是如此的要求領導人物，因此在政治上極著重人才的拔擢。他在道光卅年應詔陳言時已稱：「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認為對人才必須注意四事：即廣收慎用勤教與嚴繩<sup>⑱</sup>。於廣收方面，極著重人才的品德與氣質。在覆方子白函中說：「大抵觀人之道，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sup>⑲</sup>。」並且要不分地域及出身，多予招納。在覆李黻堂函中說：「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取之欲廣，用之欲慎<sup>⑳</sup>。」故他的部將雖多楚人，而幕府則幾乎網羅遍全國。他對人才的搜求有一種狂熱，曾說：「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sup>㉑</sup>。」在慎用方面，曾氏所採取的是先給以薪水，優加禮貌，但不必遽授以事，俾仔細觀察其是否可用。最好的明證是他對李鴻章的拔擢。初次收李入幕府時，並未予以大用，甚至故意折之，以磨其銳氣。李因不耐而離去，及二次入幕，方予重用。在勤教方面，曾氏既視君道與師道合一，故用人亦本此一精神。相信：「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化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sup>㉒</sup>。」因此他以勞苦忍辱四字教育人才，訓練他們遇事體察，要身到心到口到眼到。曾氏極端注重人才的可塑性，認為人才可分為兩種，一種多官氣，一種多鄉氣。多官氣者不樸實廉

<sup>⑯</sup> 同上書，文集，卷二，頁二上。

<sup>⑰</sup>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三上。

<sup>⑱</sup> 同上註。

<sup>⑲</sup> 同上書，書札，卷十二，頁十下。

<sup>⑳</sup> 同上書，書札，卷十二，頁二九下。

<sup>㉑</sup> 同上書，書札，卷十二，頁廿三上。

<sup>㉒</sup>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二十下。

介，可塑性太小，不可取。多鄉氣者好逞才能，出新樣行事，有樸實努力工作學習精神，可堪造就。因此希望倣效趙廣漢及劉晏，能用有鄉氣之新進少年及士人<sup>⑫</sup>。此外他主張因人的高下而施教。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對這類人才應當優予禮遇，多誇譽以鼓勵之。另一類是卑瑣而無遠志者，則當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來督導訓練之<sup>⑬</sup>。故在勸教的培育人才上，曾國藩所著重的，是一種啟發的效能與自動自發精神。在嚴繩方面，國藩所言無多，但就其思想行爲觀之，則在以禮來約束之，而刑法則僅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方用之。

要而言之，國藩整個注重人治思想的重心，在於發掘人才，造成風氣，更盼進而帶動整個國家社會的改變。而他的所謂人才，是以優良的道德，忠義之氣，肯勇於任事，處處爲國爲民作基礎的。故國藩的此一注重人治思想，實際上是完全屬於儒家的，未曾受有其他影響。就國藩一生的行事來看，他確是能本此思想，一一執行。由於他實事求是，知人善任，確實在咸同年間爲國家社會求得一批志同道合的正人君子，而共創一扭轉時變的中興大業。後世之所以對曾國藩稱道崇拜不已，其原因正在於此！

咸同年間是我國承受猛烈西力衝擊時代，曾國藩對於西方國家的認識，以及外交的因應，自亦有其看法。綜括而言，未嘗逸出其中心思想——儒家的忠信篤敬範圍。早在鴉片戰爭時期，他已注意及中英衝突，但所憤憤者是官軍不能戰但知擾民，及民間漢奸太多<sup>⑭</sup>，於西力東漸的意義並未有深刻的認識。最值得注意者，他對南京條約的簽訂，極感滿意，在家書中曾說：「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sup>⑮</sup>。」顯然他並沒有如林則徐魏源等的天朝體制觀念，較能接受事實，予西方國家以平等地位。此後由於帶兵與太平軍相戰，自然接觸到西方之船堅炮利，因而在自強的努力上，主張學習西洋的船炮之術作爲下手工夫。他曾說：「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sup>⑯</sup>」爲此他曾要華衡芳徐壽試造小火輪船，亦曾設立修械所，贊成在英購買兵輪助効，以及派容閎赴美購辦機器，創設江南製造局。但他與魏源所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政策，仍有若干不

⑫ 同上書，書札，卷十二，頁二三。

⑬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三三八～三三九。

⑭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一，頁十八下～二一下。

⑮ 同上書，家書，卷一，頁廿八下。

⑯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五。

同，蓋他祇認爲此是自強必須做的下手工夫，並不一定要用來制夷。曾說：「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sup>⑩</sup>。」而且他對當時一般的士大夫極端仇夷，以及無識的人民媚夷，甚至借夷壓華，均不以爲然。認爲當著眼其有德於我。曾說：「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勦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sup>⑪</sup>。」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的中外意識是與當時一般國人有相當不同的，他無強烈地夷夏之防的仇視觀念，反而根據傳統儒家思想的仁恕報德之說，主張中外結好。

對於當時屢屢引起中外衝突的教案，曾國藩本之求真與公正的觀念，態度亦極持平。認爲西洋如英法各國，是著名的大邦，西方的宗教天主教等，立意在勸人爲善，決不可能發生如謠傳的迷拐幼嬰，挖眼剖心製藥之事。以爲解決民教的衝突首在確實明瞭肇事之因，曲如在我，必須嚴懲，即使曲不在我，亦當渾含出之，俾彼有轉圜餘地，在我亦不失柔遠之道<sup>⑫</sup>。顯然他沒有一般士人強烈狹隘的宗教排他意識。

對於與洋人的交往，以及外交問題的處理，他本之於一生所服膺的誠敬忠信之義，主推行忠信篤敬政策。在覆李鴻章函中曾說：「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僞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又說：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疏爲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在覆應敏齋函中亦說：「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嘲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待他只有七分，不必假裝十分。旣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有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sup>⑬</sup>？」由此可以看出國藩的外交觀念，一如其爲人行事，是將儒家對

⑩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五下。

⑪ 同上書，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頁五五上。

⑫ 同上書，奏稿，卷二九，頁卅七；書札，卷三二，頁四三下～四四上，復恭親王。

⑬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三六一～三六三。

待朋友之道的誠信觀念，用之於近代外交上。殊不知近代國際政治祇有信，並無誠。蓋信是一種契約論，或行為結果論，而誠則是一種動機論。朋友之間因必須有誠，而國與國之間何能以誠論事。故曾國藩與郭嵩燾相同，將儒家誠信之道用之於近代外交，僅有部分的融合，是難得到很大成功的。國藩辦理天津教案的失敗，亦正在於此。

在外交技巧方面，國藩主張與洋人交際，不宜過峻，要帶渾含氣象，於外人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可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更當小事不妨放鬆，大事應出力死爭<sup>⑩</sup>。這一看法與道光時的耆英頗為相同，顯然失之軟弱，雖符合儒家寬厚的思想，與西洋外交上銳鏑必爭，卻相距甚遠。而近代我國權益的喪失，不少正是由於這種寬厚軟弱的作風。因此我們可以說，曾國藩由於過份執著於儒家思想，致而無法在外交上有卓越的表現！

綜括以上關於曾國藩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整個思想架構是典型儒家傳統的，受有西力衝擊之影響極少。他對咸同時代中國問題的認識，完全是根據中國的傳統，由中國內在來加以探討。對於因西力衝擊所引起的時變，認識僅止於船堅砲利，不了解那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因此他所提出的拯救中國之方，雖能平定太平天國之亂，重新穩固中國社會與道德，但在因應來自西力衝擊的時變上，是顯得較為軟弱而無力。故在中國近代時代思潮上，與李鴻章等有明顯的不同，似不應屬於應變圖新一派的，仍是以傳統觀念為中心的經世致用學派的中堅人物！

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湖南湘陰人，雖與曾國藩同屬三湘人士，同時崛起，同為湘軍主要領袖，但在性格思想行為與人生經歷上，卻不相同。就出身背景言，左宗棠與曾國藩相同，其父皆為耕讀並重的不得志書生，以教書為業，唯左氏家境更為貧寒。在性格上左氏自幼才華外露，不肯甘居人下，與曾氏的深沉穩重，迥然相異。此種差異固與兩人先天稟賦有關，似亦與曾為長子左為幼子有相當關聯性。蓋我國傳統家庭教育每於長子要求其老成持重，而於幼子則稍予溺愛放縱。左宗棠的經世致用思想產生甚早，於十七歲（一八二九）購讀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即開始有此志趣。次年並識賀長齡，蒙其賞識，一八三一年並從賀長齡弟熙齡讀書，從此經世致用思想成為其一生思想主體，並因上述的影響喜好地理學及兵學<sup>⑪</sup>。這與曾國藩早年的專攻經學，喜好三禮，可說是完全不

<sup>⑩</sup> 同上書，頁三六一～三六二。

<sup>⑪</sup> 參閱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一三～四五。

同。此後由於會試的失意<sup>◎</sup>，決心放棄科舉，另闢蹊徑，一意從經世致用思想上發展，於刑名錢穀諸務無不留心，並因館於陶澍家，得結識名流，與胡林翼訂交，一時聲名大噪。故左氏一生就師友關係而言，受賀氏兄弟及胡林翼影響最深。在人物崇拜上，曾國藩入京以後即以儒家先賢先聖作為其思想言行準則，左宗棠卻一生崇拜林則徐，以之為仰望的楷模。此外在人生經歷上，左宗棠四十歲以前未曾出外任事，甚至出外任事之後最初七年亦僅擔任湖南巡撫幕府，未曾居有官位，獨當一面，此與曾國藩編練湘軍前即已官拜侍郎，又是絕然不同。左宗棠四十歲以前雖未出而任事，但在思想行為上已具有下列的特徵：

一、極具愛國愛民之心：左氏因幼時受父祖影響，讀經史輒慕古人大節，及稍長受知於賀氏兄弟。賀氏兄弟以國士視之，益增其憂國憂民之心。故留心時務，讀書治事悉以經世致用為準。研讀賀長齡編纂之皇朝經世文編丹黃殆遍。對嘉道年間政風的疲憊，國勢的日衰，深以為憂。鴉片戰爭時期於清軍的不堪一擊，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更憤懣不已。曾致書賀熙齡：「時事至此，固亦人人意想中事，不知當局者又將何以善之。和議不成，其勢必將出於戰，而人心恇怯，帑藏空虛，言戰亦甚非易事，為之奈何。大河未復，金錢虛擲，而其事又非可得已！搜括之事雖多，銷耗之端迭出，恐借餉加賦諸敝政將繼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難言矣。仕風日下，人物渺然，思之令人心悸<sup>◎</sup>。」他於此時期曾自聯稱：「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sup>◎</sup>。」可以看出其心志鬱悶與壯闊。

二、本之於外儒內法思想，認定為政在重綱紀，進人才，重農事，他以為道光時期政治之壞在上下欺瞞，是非莫辨，故主張嚴綱紀，重主威，曾說：「竊思方今時事之壞，無過上下相蒙，賢奸失別。病源所在，攻達為先，……非嚴主和玩寇之誅，結縱兵失律之罪，則人心不聳，主威不振。正恐將來有土地而不能為守，有人民而不能為強，而國事乃不可復問矣<sup>◎</sup>。」他相信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辦寇之人，天下人才自足供一時之需，祇在如何獎拔人才，使不世出而已<sup>◎</sup>。他稱道道光帝本人是恭儉仁明，但其下則怠惰因循。認為臣之事主當如女之字人，未字之先不可預有惠姑之不慈，夫之難事，僮僕之不吾聽，與姁姊之不吾和之心。祇當於出處大節，講義氣二字。天下無不可仕之時，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作之

◎ 左氏於一八三二年二十歲時中舉，此後於一八三三，一八三五，一八三八年應會試皆未中。

◎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頁十三下。

◎ 同上書，聯語，頁一下。

◎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十七下～十八上。

◎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十九上。

官。主一切進退有據，仕止久速委諸命，可與不可表諸義。行事當注重利中之義，私中之公，則諸事自不失其正<sup>◎</sup>。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他雖未出仕，但在思想上仍恪守儒家的忠君與天命觀念，做法上嚴綱紀，重主威，又顯然有法家的傾向。

對於人民左氏本之於儒家思想，認為爲政在紓解民困，注重農事，曾說：「聚民於農，人樸心童，凡蓮之理於焉降矣。」爲此他特著廣區田制圖說，欲將古區田之制，重行於鄉里，以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左氏厭惡當時士人的好名而不務實，堅主士紳階級必須耕讀並重。曾撰其祠堂聯曰：「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爲識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還是耕田<sup>◎</sup>。」並著名利說，認爲士人最賤藝技之名，實是一種錯誤。蓋百工的盡吾力，食吾功，實遠勝於士人的沽名釣譽或巧言令色以及文章之名<sup>◎</sup>。極看重當時農業社會的儉樸勤勞美德，力勸親友持家當一絲一粟恆思物力之艱，一人一物當思處置之法<sup>◎</sup>。由於注重農業經濟及農業社會道德，氏對我國的宗族組織在社會綱紀與福利制度上的效用，了解甚深。在致賀熙齡函中稱：「治家之道與治國同，其規模不可以不宏且遠也。鰥寡孤獨月有餼，則窮宗之無告者有託矣。公田族倉歲有蓄，則貧難之遭荒者不死矣。胎養之穀，育嬰之錢具，則子女之不能舉者育矣。恤嫠之堂，孤兒之社成，則苦命之不自存者全矣。義塾之設，大課之程，試卷之貲，獎賞之費備，則孤寒之不能讀者勉矣。然後立族正宗長以督之，擇子弟之能者經紀之，考冠婚喪祭之禮以整齊之，仲春仲冬大祭祭畢而宴以聯絡之，宴畢揭家訓而申敍之，察其賢者而尊獎之，察其不率者而訓責之。誠如是，則其家亦庶幾乎治也<sup>◎</sup>。」顯然左氏是本之於大學的觀念，將齊家與治國合而爲一，並認爲農業經濟與宗族社會是此一齊家治國思想的最根本基礎，而土紳階級則爲此一整套理論架構中的領導階層，因此必須耕讀並重，亦必須督導其宗族。鴉片戰後，由於目睹天下將亂，於治國既然無機遇可施展其抱負，遂謀退而獨善其族，曾與郭嵩燾等相籌謀，舉族遷徙深山交通阻隔處，共組一類似桃花源的世外樂園。日後雖未能實現此一理想，但於農事，始終講求不已，曾購買田莊，自行耕種，實驗其所倡導的區田之法，並分類編著樸存閣農書。

三、認識國際局勢，主各省自籌防禦，講求製造船炮之術，俾師夷長技以制夷。鴉片戰爭時期左宗棠正當盛年，三十歲左右，本之於愛國熱忱，在基本態度上

<sup>◎</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廿八下～廿九下。

<sup>◎</sup> 同上書，聯語，頁一上。

<sup>◎</sup> 同上書，文集，卷一，頁一，名利說。

<sup>◎</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八上。

<sup>◎</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廿四。

主張痛懲英人。爲此他考覽唐宋以來的海防記載，屢致書賀熙齡論戰守之策，並於西人的東來通商，有相當之瞭解，曾說：「自前明永樂中七遣中官撫諭諸夷，諸夷慕中土人物之盛，不遠數萬里爭先款貢求貿易之利。及乎中葉，已來佛郎機荷蘭，恃其炮大船堅，屢犯浙閩沿海州郡，以求貢市，終明之世未能與之絕也。國初荷蘭首先效順，助討海寇，故許其八年一貢，二年一市。……自康熙二十四年海宇乂安，從疆吏之請，大開洋禁，於是英圭黎者始請貢來朝。英圭黎即今之英吉利，字與音經數譯而訛耳<sup>⑬</sup>。」他認爲中外通商不可絕，但必須在戎務告竣以後。與英人相戰，由於其砲火精猛，利於仰攻，不利俛擊，利遠擊，不利近攻，故當於城根河岸設障蔽，藏精卒，與之近戰<sup>⑭</sup>。對於當時的防務，左氏主張各省自用其力量防禦，爲固守持久之謀。並當練漁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譏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叙功<sup>⑮</sup>。於林則徐對英人實行總體戰之做法，認爲深得我心。對於當時的和議，極不滿意，相信：「市不可絕，則鴉片不可得禁，自此億萬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sup>⑯</sup>。」看法與劉韻珂夏燮諸人相同，以爲從此「諸戎狡焉思逞，無有紀極，而國威屢挫之餘……，則內訌外侮必且表裏相應<sup>⑰</sup>。」因此盼望能力圖振作，鞏固海防，講求造船造炮之術，俾師夷長技以制夷。故此時左宗棠在整個看法上，與林則徐魏源相似，唯值得注意者，他對海權的興起，已約略有所認識，因此主張興辦造船廠，並改革舊有的水師。所可惜的是，他日後思想並未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始終停留於此一境地。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左宗棠四十歲，因湘撫張亮基之邀，而入其幕府，專負責兵事。從此逐漸步入宦途。蓋時太平軍已入湖南，進攻長沙。唯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以前，左宗棠的仕宦之心並不強烈，祇希望爲保衛鄉梓——湖南而工作。此是因他了解入仕必須具有高級科舉進士功名，而自己不過僅有一舉人資格，是難於出人頭地的。他的決心帶兵出湖南平亂，一方面係因爲總兵樊燮所讒，無法再在湘撫幕府工作，另方面亦因目睹胡林翼曾國藩均以軍功而顯赫一時，故在胡曾的援引下，終於自成一軍至江西出勦太平軍。

左宗棠最初對太平天國的興起，並無曾國藩的感受，以爲有碍於道統。但及太

<sup>⑬</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廿二。

<sup>⑭</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十五下。

<sup>⑮</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十一下。

<sup>⑯</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廿二上。

<sup>⑰</sup> 同上書，書牘，卷一，頁卅四上。

平軍兵鋒逼近長沙，方了解將是一世變，無法獨善其身，因此出而爲湘撫主持軍事。他認定清軍作戰的失利，除軍務廢弛的因素外，主要在於不明主客之勢，致而「賊常爲主，而我常爲客，致賊暇而我忙，賊逸而我勞，賊設伏設險以待我，而我輒中其計」，因此根據兵法「謀定而後戰」及「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理論，主張團練鄉民，廣設碉堡，步步爲營，先佔險要之地，然後嚴號令賞罰，逐漸進逼，迫賊反撲，則主客形勢有所轉變，而可獲勝<sup>⑩</sup>。日後湘軍正是用此一戰術而能平定太平軍，可知左宗棠於兵學確有心得，亦能洞悉太平軍作戰的缺點。正因爲如此，他的與太平軍作戰，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很快地於短短兩年之間，已升擢爲浙江巡撫，日後並官拜閩浙總督，地位與曾國藩相埒。

左宗棠在湘撫幕府時期對湘勇的成軍，特別是湘軍水師的組成與籌餉，貢獻極大。他對團練的看法是：「團練云者，取其自相團結，免爲賊所擄掠裹脅而已。自扞鄉里，人有固志，熟於地形，便於設險，愚者亦能出奇，怯者亦能自奮<sup>⑪</sup>。」大體與曾國藩相同。唯於勇營，則主張一定要有屬於將領的親軍，更最好親身招募，作爲核心部隊，曾說：「凡爲統將者，必親兵人數多於增附人數，然後運掉易而呼應靈。若選募者一人，而統領者一人，或本部少而增附多，則驛難浹洽，動形阻迮<sup>⑫</sup>。」而他選勇及營官哨長的標準與曾國藩不全相同，以能拼命打硬仗爲主，並非全是樸實之農民。爲此曾推薦塔齊布於曾國藩，使之成爲湘軍早期主將。他認爲帶勇之道在待之以誠，固結其心，諸事我不疑人，人自不疑我，則可團結一致。兵勇並非人人皆強，亦非皆怯，作戰時使強者先而怯者繼之，則怯者亦強<sup>⑬</sup>。認定太平天國之所以能長驅東下攻佔南京者，在有強大水師。故力勸曾氏設立水師，並助湘撫駱秉章設局製造船砲。對於籌餉，他所採行的辦法是：開征厘金，販賣淮鹽，以及厘剔田賦弊端，故使湘省收入大增，能維持每年二百萬兩軍費的開支。

對於吏治，左氏認爲「患亂之生由於民情之不靖，民情之不靖是由於吏治之不修。」吏治之不修，人民失於教養，迫於饑寒，致盜賊興起。此時盜賊勢力甚小，數健卒縛之而有餘，但因爲丁役的庇縱，官幕的畏煩，或是非顛倒，罪及原告，人民乃隱匿不報，甚至被脅從，使亂事坐大。故肯定任何內亂的興起，在於吏治不良，爲政之道首在察吏。他將治民與馭軍看作同樣道理：馭兵之要在將領得人，治民之要以選吏爲先。故服膺儒家傳統，重人治，要獎掖人才的不世出。爲使人才能

⑩ 同上書，書牘，卷二，頁二上至五上。

⑪ 同上書，書牘，卷二，頁三下。

⑫ 同上書，書牘，卷五，頁四一下～四二上。

⑬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三〇。

够崛起，他的看法與曾國藩亦不同，是主張用法家的手段，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以威與勢來整頓綱紀。因此無論是在湘撫幕內，或出任巡撫總督，他對失職的官員將領，均嚴加懲處，雖親友亦不稍予假貸。甚至居湘撫幕時，於湖廣總督楊霈的無能不滿，曾草奏欲彈劾之。故胡林翼曾批評他：「性近矯激，善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sup>◎</sup>。」

對於人民，左氏根據孟子的看法，認為仁言不如仁聲深入人心，主通民情，求民隱，惡其所惡，治惡人，革惡俗。如此則人民怨之者少，德之者多，政令方可無阻的推行。任浙撫及閩浙總督時期，目睹戰區兵燹之後，繼之以饑饉疾疫，十室九空，殘黎靡有孑遺，田土荒蕪，乃嚴令地方官，深體親民要義，諸事當有憇惻之心，政令應注重實際與講求效率。他所推行的戰區善後政策是：一、賑濟與撫輯流亡並舉，二、積極扶助及招募農民墾荒復耕。在賑濟與撫輯流亡方面，令所屬各軍，盡其可能煮粥賑濟災民，散發醫藥及寒衣，收買茶筍廢鐵，修濬河道，以工商代賑。亦令所屬各府縣籌設賑濟機構，積極鼓勵士紳還鄉，重建社會秩序，捐輸救濟災民。在召民墾荒復耕方面，他飭府州縣購買豆穀、種籽及耕牛農具，召集鄰省農民前來耕種，並令各軍暇時助耕，甚至將田地整理就緒後，交予農民耕種。為改善農民生活他極力提倡栽桑養蠶及種茶植麻棉等經濟作物<sup>◎</sup>。要而言之，由於其本人起自貧寒，注重農事，故以農民及農業作為施政重心。

對於士紳，此時左氏看法與早年不同，他雖仍然看重士紳階層在社會中的作用，但十分厭惡士紳的妄發議論，徇私干政。於浙紳的依恃京官，時向清廷誣譖地方官，尤感不滿，曾說：「浙江民風公戰則怯，私鬪則勇，富者急於求利，貧者拙於謀生，遇賊匪則畏之，見兵勇則欺之。其弊也民與兵勇仇，紳與官吏仇，久且民與民仇，而械鬪之患起；紳與紳仇，而傾軋之計生<sup>◎</sup>。」於福建的強宗凌世，勾結官吏盜匪，亦深不滿。因此他一面嚴懲不盡職之地方官，一面亦對惡紳繩之以法。所到之處，必查辦惡紳，抑制強宗，召見耆宿，痛切訓誨，希望能革除疵俗陋風。故左宗棠此時思想與曾國藩所主張的禮治，以及自己過去注重宗族看重士紳均不相同，更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法家傾向，希望透過嚴刑峻法來移風化俗。

對於商人，左宗棠由於其重農思想，以及商人的貪利，一向是印象惡劣的。認為多是自私自利，依財欺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買辦商人，認為絕大多數是趨利如

<sup>◎</sup> 同上書，頁四三二～四三三。

<sup>◎</sup> 左文襄公年譜，卷三，頁十下～十一上。

<sup>◎</sup>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頁十八。

鷺，挾洋自重，橫行鄉里。他曾飭令上海寧波買辦商人楊坊捐米五萬石濟賑，楊坊僅允出銀二萬兩，內中尚有京米捐一萬兩，他極憤怒，奏請捉拿，認為楊坊為富不仁，依附洋人，欺壓官府，經理洋務，從中漁利<sup>◎</sup>。

左宗棠素以善理財知名，而其理財的原則約略與馮桂芬相同，著重在厘金與鹽課，亦即以征收商業稅及貨物稅來增加政府收入。在湘任幕府時期，於咸豐五年四月設厘金局，開征百貨厘金，值百抽二三，咸豐六年三月復設鹽茶局，開征鹽茶厘金，鹽每包抽錢七百文，茶每箱抽銀四錢五分<sup>◎</sup>。並均採兩起兩驗之法。於閩浙時依然如此整頓厘金，不顧眾人的反對，仍採兩起兩驗之法。他承認厘金病商，但認為是一種權宜之計，如此不直接為害多數人民，又收利迅速，故仍是最好的權宜之計<sup>◎</sup>。顯然重農抑商的思想對他有深厚的影響。對於鹽課，在湖南為籌措軍餉，曾奏請撥淮鹽十萬引，於湖南銷售，以其應納鹽課半數接濟軍餉<sup>◎</sup>。於浙江福建則廢引推行票法。由商納資到庫，官府給票認地運銷，於各府設局稽查，並一切刪繁就簡，革除浮費，以所入鹽課全數提歸軍用，頗獲成功<sup>◎</sup>。為將蘇南皖南收歸浙鹽銷區，竟不惜與曾國藩相齟齬。對於田賦，左宗棠無論在湖南及閩浙，均曾予以整頓，其基本政策是剔除浮費，甚至於減賦，以使農民負擔減輕，而願踴躍繳納，少予拖欠。在湖南他將漕米折色每石征銀六兩，改為每石征銀三兩，減去一半。在浙江則因該省田賦一向過重，毅然奏請全額統減三分之一。

在軍政方面，左宗棠一向主張精兵足餉，無論在閩浙或陝甘以及新疆，均本此原則改革軍政。曾將湘軍李元度所部十五營，裁汰三分之二，僅保留五營。亦曾將閩浙制兵員額裁去百分之四十以上。並將制兵老弱淘汰，補以精壯之湘軍。福建一向積欠軍餉甚多，至同治三年底（一八六五年初）高達二百五十餘萬兩。他除飭藩司發給銀票外，並商借外債及奏請撥用海關稅銀，盼能清舊欠及足新餉。同治五年大量減裁制兵後，將其軍餉調高至馬兵每名月加七錢，餉共二兩七錢，步兵每名月加一兩五錢，共二兩五錢五分，守兵每名月加一兩四錢，共二兩四錢。不僅待遇大為改善，並將各兵種的差距，亦拉平至合理情況<sup>◎</sup>。而且將各軍分批調訓，使之兼習洋槍。水師亦然，並分班更換上船出洋巡緝，使熟悉地形，勤練槍炮。他的湘軍

◎ 同上書，奏稿，卷六，頁六。

◎ 駱文忠公奏稿，卷八，頁九上～十一下。

◎ 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六，頁卅四上。

◎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三一。

◎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一，頁五上～六下。

◎ 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四四九。

在浙江作戰時期已逐漸使用西方新式武器，後並在福州用法員調訓若干部隊，及勦擒平回時，各軍幾已完全採用西方武器。新疆的底定，據彼自稱，則得力於克虜伯小炮及七響連發後膛槍。

左宗棠在經世致用思想上，最為人熟知並稱道者，則為他對邊疆的注重。早年他喜好地理學及兵學，即曾自繪全國地圖，於圖中添註山川形勢相關資料，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成輿圖說，除於山川道里疆域沿革詳加記載外，並條列歷代兵事，俾了解兩者間相互關係，於邊疆，特別是西北邊疆，注意尤深<sup>⑩</sup>。故日後之所以能在西北成其勳業，是絕非偶然的。任浙撫及閩浙總督時，留心臺灣事務，曾說：「臺郡如鎖，澎廈如鑰，鹿耳門鹿仔港則啟鑰之竅也。兩處為全臺最要關鍵，而以見在形勢言之，鹿港尤要<sup>⑪</sup>。」時臺灣發生戴潮春之亂，主張必須予以痛勦。曾說：「官軍戰勝，則民不畏賊而畏官軍。一戰之後，解散必多矣，解散多則所殺者眞賊。打一仗是一仗，辦一起了一起。不惟目前易於收功，且足令海邦浮動之民有所畏而不敢逞，此數十年之利也<sup>⑫</sup>。」他曾欲親自渡海巡臺，徹底整頓臺政，但因奉命督陝甘，勦擒回亂而罷。此時左宗棠對臺灣的看法是：因遠隔大洋，聲氣與福建不易相通，官員遂遇事專制，不肯遵令辦事，甚至欺飾彌縫，於是軍政吏治均大壞。再加以民俗挾仇械鬭，官員借機勒索，於是形成民忿官之庸貪，乃自相結黨，私鬭浸成巨案。他所提出的根本辦法是，選派廉正明幹道員，時以洗冤澤物為心，嚴操守，勤訪治，孜孜奉公，如此方能澄清吏治，固結人心。再配以精誠合作實心任事肯予改革之總兵，臺灣吏治及軍務方能逐漸上軌道。為此曾奏薦吳大廷出任道員，湘軍將領劉明燈出任總兵。此外，在赴陝甘任前，奏請立即在臺辦理下列諸事：

一、恢復班兵制度：氏於當時班兵制度名存實亡，一切仰仗勇營，有所憂懼，仍主切實恢復班兵制度，三年更戍，俾軍力充實，治安防務鞏固。

二、加重臺灣道員職權，恢復道標，申明鎮兵歸道員監督，俾互相牽制，而肅軍政。他對當前的文員無權，軍人虛冒侵欺，縱兵為奸通匪，深感不滿，認為是全臺禍根。

三、整頓水師，使船械充實，員弁能戰：於當時水師有名無實，經費為武員侵吞，極為痛恨，認定必須革除。

四、徹底革除規費，將樟腦鴉片鹽課諸收入悉數歸公。左氏認為臺灣吏治之壞

⑩ 左文襄公年譜，卷一，頁十七。

⑪ 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六，頁十三。

⑫ 同上書，書牘，卷六，頁廿四上。

在地方官有收取規費中飽私囊的陋習，必須加以革除，才可使吏治澄清，財政稍裕，民心穩固。

五、歸化生番應比照內地人民，一視同仁：對過去部議不允，視為莫大失策。

六、宜弛前往移墾禁令，慎防洋人覬覦：左氏了解內地生齒日繁，游民輻輳，故當廢止前往移墾禁令，免造成我棄人取，為洋人所趁。

七、臺地產米，當廣立社倉，儲存米糧，有益民生<sup>◎</sup>。

由他的這些建議，我們可看出，左氏不僅了解臺灣的實況，而且所提出的辦法亦均是切中時弊的。日後沈葆楨在臺所推行的辦法，大體上不出他的範圍。由於在福建沈葆楨與其關係密切，亦極有可能，沈氏在臺的措施仍是受有他的影響。由此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何在中法戰後他於死前的遺奏中，力主臺灣改建行省。

至於西北的回亂與新疆問題，左宗棠在根本上了解此與太平軍及捻亂不同。蓋因宗教及民族的不同，以及回漢相仇日久，亂事平定後則必因漢回的雜處與齟齬，仍會叛亂再起。因此於陝甘回民主採漢回分離政策。他於陝回就撫後，分別安置於化平川廳平涼大岔溝北原及秦安清水諸縣，並奏設化平川廳通判都司諸職官治理之<sup>◎</sup>。於甘肅回民，不僅要與漢民有所區分，設專區予以安頓，將漢民置於狄道金縣安定會寧一帶近城鎮處，回民則安插於遠離城鎮驛道及漢莊處，而且他將回民亦分為客回與土回。客回大多來自陝西，以為不宜與土回雜居，飭令仍回陝西安頓。根據他個人的說法，他的治陝甘回民政策是：渙其羣，孤其勢。使回民分為小股，置於荒絕之處，由官扶助，予以墾荒營生，並為避免其宗教首領阿渾有太大的影響力，他在回墾區編定戶口，十戶設一長，百戶設百家長，主持一切戶婚詞訟，欲透過此種政教分離的聯甲制度，來逐漸變更其俗，而達到同華風的目的<sup>◎</sup>。左氏目睹新教在陝甘回民中勢力太大，因此奏請禁止新教，扶植老教，希望予信亂之新教以嚴重打擊<sup>◎</sup>。此外，並在文教工作上，盡量鼓勵回民子弟讀書，刊印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書，頒發州縣學校，令予朔望之日宣講，俾促進其漢化。他的此項分離措施雖於日後回民勢力的分化產生極大的作用，但於回民遷徙途中，亦造成重大的死亡。陝回亂前有七八十萬人，亂後僅存者約十分之一。甘回亂後安西肅州甘州一帶二千餘里，絕無回民聚處<sup>◎</sup>。

<sup>◎</sup> 同上書，奏稿，卷十九，頁四三上～四六下。

<sup>◎</sup> 同上書，奏稿，卷三六，頁卅八上～卅九上。

<sup>◎</sup> 同上書，奏稿，卷三八，頁廿四上～廿六下。

<sup>◎</sup> 同上書，奏稿，卷卅八，頁六二上～六六上。

<sup>◎</sup> 同上書，奏稿，卷四三，頁五三上～五六上。

左宗棠對新疆的經營又與陝甘不同，他認為新疆地位對中國本部極為重要。曾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sup>⑩</sup>。」因此反對籌措經費注重海防，而忽視塞防，不規復新疆。由於他熟知新疆地理情勢，相信現今所據之形勢，遠較俄人為優，俄人不至於為此與我兵戎相見，爭必不可得之地。並可以屯田辦法解決部份軍食補給問題。故在他的積極籌劃下，終能一舉而消滅阿古柏，使新疆重歸我國版圖。他的新疆善後措施，一如在閩浙及陝甘，注重兵勇協助民眾，興辦交通建設，移民墾荒實邊，廣興農田水利，獎勵與推廣食糧及經濟作物稻米蠶桑等，整頓財政田賦，設立郡縣，改為行省，以及大力推動文教工作等。其目的在一於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使其豐衣足食，不再蠭然思動。一在於加強與中國本部的結合，逐漸內地化，使其真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無論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均融合而成一整體。在此一大前題下，他在新疆所行的回民政策，又與陝甘略有不同，不是回漢分離分治，而是鼓勵漢回雜居，俾能加速其民族融合。此是因新疆漢民人數過少，不如此其內地化政策難於有效進行。由於他與劉錦棠不斷的努力，此一目標至二十世紀初年，約略初步完成。不僅北疆若干大城市如哈密、迪化、奇臺，漢民人數已超越當地居民，即南疆回民勢力根深蒂固之區，漢民人數亦在激增，漢文化亦在快速發展之中。故左宗棠的西北經營，無論就國家整體利益或中華文化的發展而言，均是功垂千秋萬世的。我們可以說，道光時期以來的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在經世致用思想中對西北經營的看法，是在他手中加以實現，加以完成的。如果說曾國藩的經世致用思想最大貢獻在於中國本部，則左宗棠在於臺灣及西北邊疆，兩人同是咸同年間經世致用思想上的巨人！咸同年間是我國自強運動時期，在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文祥以及平定太平天國勳臣之一的李鴻章等大力提倡下，中國展開了興辦洋務運動。左宗棠的洋務認識雖然產生很早，如前所言，他於鴉片戰爭時期，已主張仿造西洋船炮，對海權時代的來臨也有初步認識。但終其一生始終停留於此一階段，他在此方面的成就非僅遠遜於李鴻章、張之洞，甚至亦距劉銘傳甚遠。他出任總督以後，除所部湘軍因時代潮流所趨，逐漸改用西方武器外，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於一八六六年興辦福州船政局。他曾說：「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中國

<sup>⑩</sup> 同上書，奏稿，卷五十，頁七六。

「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輪船之利在：「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廬肆，匪獨魚鹽蒲蛤足以業貧民，舵舶、水手足以安遊眾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輸，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sup>◎</sup>」。顯然他已了解輪船對交通及海防的重要，但是他與當時一般國人相同，始終沒有興造輪船軍艦與西人作海上——甚至遠洋——爭鋒之心。故就他的這種思想而言，是遠不及李鴻章視海權時代的來臨，對中國是三千年來所未有的變局來得透徹，亦沒有李鴻章所說：「海有鐵甲艦，陸有鐵路，此乃真實聲威」來得壯闊，故左氏的海權認識，約略與林則徐魏源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思想相倣，至多他祇是將守海口推展到近海的地步而已。值得稱道的是，他辦福州船政局，堅持洋人必須五年內教會國人自己製造及駕駛，亦即極注重技術的轉移。但是在另方面他將創設船廠的工作，交給並不以海軍見長的法人，也種下船政局在造船技術上始終無法突破的重要潛因。

左宗棠在觀念上既認定製造輪船極為重要，而且他興辦福州船政局為時極早，故因此而產生一種頑固錯誤的看法，即誤認為，西方的各種工業均可由造船機器生出，曾說：「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炮、炸彈、鑄鐵、治水，有適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sup>◎</sup>。」視造船為西方工業之母，祇要造船，即可無所不能，無所不精，顯然將西方的工業化視之太易。而他之所以日後對洋務認識不能有精益求精的猛進，亦種因於此。故終其一生，在興辦洋務上除創辦福州船政局外，僅於蘭州辦有織呢廠，小型機器局（兵工廠），於新疆設有鑄錢局，未曾如李鴻章興辦鐵路電線開礦紡織廠各種新企業，亦未曾如張之洞在武漢建立新式工業中心。在採用西式武器方面，亦是如此。由於與法常捷軍的併肩作戰，左氏的湘軍很早即逐漸採用西式軍械，此後在閩浙總督任內，亦正式聘用法員為敎習練兵，先後調訓軍隊七百人。及北上勦擒回，其部隊已大量使用西式軍械，而且多為德械，並用德人為敎習。但在根本上，左氏始終不以採用西操為然。他僅承認西洋槍炮火力的精猛，於兵學則中國自有其長，不必多學西洋<sup>◎</sup>。因此在使用西方的槍械上。他的觀念亦是停滯不進的，並未因西式武器的使用，帶動整個的軍事現代化。年齡的過長，思想的定型，是造成他不能如李鴻章般接受新觀念的一項重要原因。此外，洋人的攬權，亦是使他在軍事上不敢多用洋人的一項牢不可破的疑懼。

<sup>◎</sup> 洋務運動文獻彙編，臺北世界書局本，第五冊，頁五~六。

<sup>◎</sup> 同上書，第五冊，頁六。

<sup>◎</sup> 同上書，第三冊，頁五九七~六〇三。

在夷務方面，左宗棠無論是在對各國的認識以及外交的因應上，亦都是不及李鴻章的。也許是由鴉片戰爭的關係，他對英人印象惡劣，於一八六五年時曾致總理衙門說：「各國之中，惟英人最狡詐。各國雖均一謀利之心，尙聞存見好之意。至英人則食桑甚而不懷好音，難以情喻理。」<sup>203</sup>在閩浙總督任內，一再因英人暗助太平軍，干預福州船政局的設立，與之發生齟齬。甚至認為一八七四年日軍侵臺，係巴夏禮所嗾使。<sup>204</sup>及用兵西北，為籌措軍餉，他飭胡光墉在滬廣借洋款，英使威妥瑪因滇案未結，禁英商借款中國。他聞之大感不快，除認為英使目的在居為奇貨外，表示素與英人不甚交結，亦不願與英交結，並飭胡光墉辦借款時，必須問明非英款才可議借。<sup>205</sup>此外他對英人在新疆暗助阿古柏，向中國要求承認阿古柏為屬國事，極為不滿。認為總署及李鴻章對英態度過於軟弱。伊犁事件起後，他對英人的出面調停，亦認為是另有用心。總之，左宗棠在對西洋各國的印象中，以英國最壞。由於這種偏見，他對美國的了解亦不深。唯一的正確認識，是英俄在中亞有利害上的矛盾，英人是助阿古柏抗俄的。

左宗棠在閩浙作戰時，與法國親近，此一方面是因與常捷軍並肩作戰的關係，另一方面亦是受法人日意格德克碑個人態度恭順友好影響，再加以法人在閩並不幫助太平軍，故日後創辦船政局，交由日意格德克碑負責。當時他認為法人忠誠可靠，甚至竟一廂情願地認為法國造船居世界前茅，遠好於英國<sup>206</sup>，法國並不袒護天主教。對天津教案法使聲稱必待本國音信，亦認為本是實事，並非別有用心。普法戰爭法國戰敗，他主張借此機會，予以調停，或向法人示恩，俾使法人知感。<sup>207</sup>充份反映出在咸同年間，左宗棠是相當親法的。但由於福州稅務司法人美里登一再要求練兵，甚至干預船政局事務，其對法國的印象逐漸轉惡，故於勦回期間，不用法員為軍事敎習，不購買法式軍火。中法戰爭時期，他更明白指出，法人目的不僅在越南，亦將使「廣東邊宇危，滇黔之邊腹均形棘手，」因而積極主戰。<sup>208</sup>

左宗棠久在西北，與俄國交往自多，他對俄國的認識是：「在外國最稱強大，其國境東西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故生齒滋蕃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泰西各國大略相同，火器精利亦復相

<sup>203</sup> 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七，頁廿四。

<sup>204</sup> 同上書，書牘，卷十四，頁廿二下～廿三下。

<sup>205</sup> 同上書，書牘，卷十六，頁十八上～十九上。

<sup>206</sup> 同上書，書牘，卷十四，頁五三下～五四上。

<sup>207</sup> 同上書，書牘，卷十一，頁廿七。

<sup>208</sup> 同上書，書牘，卷廿六，頁四一上～四六上。

似。」西征期間，為減少俄人干預之可能，曾採取曲意結歡的辦法親俄，曾說：「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為強，謔以求伸。」<sup>20</sup>此時左宗棠相信俄人與阿古柏之間有矛盾存在，俄人對新疆並無領土野心。於俄人經陝甘往新疆回國者，均予熱烈招待，並在俄國購買西征軍軍糧。甚至認為允俄嘉峪關通商，與我無害。並趁俄人態度甚為友好時，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滅阿古柏，收復新疆。故此時期左氏親俄策略的運用，是相當成功的。及伊犁問題興起，左宗棠對俄態度轉變為強硬。他認為崇厚所訂條約喪權辱國太甚，非僅伊犁與烏什阿克蘇之聯絡斷絕，無西路之援，且南疆失北路之險，形勢孤露，難於長久保有。<sup>21</sup>要求清廷堅決不予批准，主以實力解決問題。曾說：「看自己強弱何如，我實在能強，則無理亦說成有理；我不能強，則有理亦說成無理。」<sup>22</sup>積極佈置軍事，親身出關坐鎮新疆，以堅決備戰姿態，作外交後盾。但亦嚴飭諸軍，不可輕於啟釁，予俄人借口。他不相信俄人有力以海軍攻擊中國沿海，而以為俄財政空虛，無啟衅之力，不過虛聲恫嚇而已。<sup>23</sup>要而言之，左宗棠的對俄態度一如對法，相當看重中國主權的，在中國主權受到其所親國家侵害時，他則毅然改變態度，以之為仇敵。故左氏的對外態度實際上是本之於國家利益，決不肯以個人的喜惡而有害於國家。

左宗棠晚年最欣賞的國家是德國，自平陝甘回亂起，他即大量借德款，購德國武器。他最稱讚的德國武器是螺旋後膛開花大炮及七響連發後膛槍與克虜伯田鷄小炮。他除用德員哆哩吧為軍中教習外，並用德人福克辦蘭州織呢局及大量購買德武器。左氏對德的了解是：「通商各國惟德最早，即普樂社，又呼為波落斯布洛斯。粵人稱單鷹，以其船上所畫之旗名之。近因大敗法蘭西，各國尊之稱為皇上，始更名德國。其國俗樸厚謹願。」<sup>24</sup>光緒初年沈葆楨派福州船政局學生赴英法留學，他曾建議同時派學生赴德。他欣賞德國，除武器精良，民性樸厚謹願外，亦在於德國是遠國，對華無政治野心。

對於日本，左宗棠最初的看法與曾李及恭親王奕訢相同，應當允其通商，不要多所裁抑，曾說：「與其含怨而終不制，曷若樹德而先為之所。」但及日軍因牡丹社事件侵臺，他才認識「島族性情貪詐傲狠，不可深信。」對於美國左宗棠似無認識，僅在觀念上視與英法相近。

<sup>20</sup> 同上書，書牘，卷十一，頁四五。

<sup>21</sup> 同上書，書牘，卷廿三，頁四八上～四九下。

<sup>22</sup> 同上書，書牘，卷廿三，頁四一上。

<sup>23</sup> 同上書，書牘，卷廿四，頁七十上～七一下。

<sup>24</sup> 同上書，書牘，卷廿四，頁五六下～五七下。

綜括左宗棠對各國的認識，我們可以說，除對俄國略具認識外，其他均甚敷淺，難與李鴻章相比的。所值得稱道的，他有強烈的主權觀念與國家意識，堅持自強，認定外交與國力有不可分關係，不主與列強結盟。

在夷務的因應方面，左宗棠任官以後，絕大多數時間均在率軍征討，僅有極短時間直接參與外交交涉。在基本原則上，他主張與外人辦交涉應切實認真快速，不可敷衍搪塞，使問題趨於複雜。亦當堅守成約，不可輕言讓步或視條約爲具文。他反對秘密外交，亦不持曾國藩、郭嵩燾誠信外交的看法，但主以公平正直的態度對待洋人。對於覲見禮儀之爭，他認爲洋人必不肯行跪拜禮，與其爲此紛爭，何若允外人以見其國君禮入覲。於遣使駐外的問題，他主張積極推行，人才可予沿海疆臣中訪擇。對於外人游歷問題，他以爲既無法可以防止，不如寬大處之。他所經辦的外交事件，大多無足輕重之邊區地方性事件。最成功者，則爲用兵新疆時治購俄糧五百萬斤。當時總署反對，而左氏置之不理毅然與俄簽約，竟因此與俄結好，而減少其西征困難與阻力。此外他在新疆盡量堅守條約規定，任何與俄糾紛均迅予解決，不予俄任何借口，亦可視爲外交的成功。但任職總理衙門負責與英人交涉鴉片加征厘捐時，則未得到成功。時左氏採交涉公開，欲以公議迫英人就範。左氏在夷務上最爲人詬病者，則是爲西征所借洋債極濫，利息有高達月息一二・五%者。他在外交上與李鴻章最大的不同，是不玩弄外交技巧，亦不買空賣空，以夷制夷，堅守自強，站穩立場。他相信如此方能不爲外人所欺弄。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左宗棠在經濟思想上是一個民本及重農主義者，他欲以澄清吏治，改革租稅，注重栽培經濟作物，來扶助升斗小民，使其安居樂業。因此對西方衝擊而產生的社會變遷——重商現象，不予注重，甚至由於口岸商人的惜財與缺乏國家觀念，他要壓抑之。致而在對西方的認識上，他無法瞭解重商與國家近代化——至少工業化間的關係。在政治思想上，左氏是具有濃厚愛國家與忠君思想的，他一生行事不僅公忠體國，而且鞠躬盡瘁的爲清廷服務。在對外關係上無時不以尊崇國體，努力自強，維護國家權利爲念。甚至個人一言一行，也極端注重維護統治者的威嚴與權力。在他困頓未出或失意時，未嘗指責過君主太后有何錯誤，祇怪庸臣誤國，堅信政治良窳在於人才的是否崛起。而他的才崛起觀念，是以維護傳統及國家與統治者利益爲必要條件的。爲了維護統治者的權威，他主張嚴刑峻法。故他的思想中始終有法家注重權威的傾向，甚至如將其經濟的民本及重農觀念，與政治的國家主義及權威思想相較，後者尤重於前者。前者僅能在不

違背國家與權威大前提下，才能存在。由此更可以看出他外儒內法的經世致用思想特徵。就社會觀念言，左氏了解宗族制度與士紳階級對我國社會的重要，無論是前期注重宗族與士紳，以及後期要裁抑強宗與劣紳，都反映出他是具有注重父權的傾向的。這與其政治及經濟思想合而構成他是一個典型的保守主義者。而且這種保守的傾向，是使他在西方認識上，無法向前邁進一步，達到認識西人近代化的程度。在文化思想上，左氏由於非進士出身，對其一生產生重大影響。他的注重實學固然與此有關，但不注重詞章之學，與少言孔孟思想，顯然亦是種因於此。由於他對中國傳統與國家的信仰，他所謂實學僅及於中國的兵學地理學與刑名錢穀等經濟之學，使其經世致用思想未能脫出傳統窠臼，更進一步採用更多的西法，來應變圖新。這是他不如比他年輕的李鴻章張之洞的，甚至較他年長的馮桂芬亦略遜一籌。顯然他的思想是與曾國藩屬於同一個時代的；祇是較曾氏具有法家的傾向罷了！

## 五、結論

綜括上述道咸同三朝經世致用思想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此一逾半個世紀的經世致用的思想，約略具有下列特徵：一、這些學者是具有漢代通經致用，宋代經術與治事並重精神的，因此他們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及經世濟民三者視為一體，而且在三者之中，尤其注重尊德性，無論是道光時代的魏源，或咸同年間的曾國藩，甚至左宗棠，均反映出此一特色。故而在整個經世致用觀念上，他們服膺大學修齊治平之說，在理想的最高境界上有「內聖外王」的憧憬，由於不能將道德與治事截然分開，而所謂的道德與學問又多是純粹傳統或中國式的，於是在整個思想上束縛於傳統或儒家思想之中，因此限制了他們對西法的接納，使其無法在近代化的觀念上有突破，僅能及於船堅炮利的軍技方面。由此或者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其主政者在思想觀念上有所突破，才能有長足的發展，而這三朝的大多數政治領袖人物在這方面顯然尚未達到如此境界，故他們所倡導的改革，始終未能在主體上脫出傳統的範圍。

二、他們在認知上雖承認有變局，或變的觀念，但這種認知究竟受西力衝擊而產生者少，其主要仍是來自目睹清代中期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衰象而產生，致而其注意力亦集中於此方面，再加上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所謂的三代，故其措施亦遂以中國傳統的理論因應之。因此我們祇看到他們要求德治與禮治，要求重建整齊劃一的農業與宗族社會秩序，於是對西力衝擊的因應，顯得雜亂無章，軟弱無

力。

三、他們承認動亂之源來自於貧窮，瞭解為民求富的重要，但是由於無法擺脫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於是使他們求富的理想僅及於人民生活的安樂，無法更高一層達到累積資金，推動工商繁榮的經濟近代化地步。而使他們求富的理念，產生不出推動國家社會巨大變動的原動力，始終徘徊於傳統之中。

四、他們在思想觀念上究竟與乾嘉時代有所不同，注重當代與實用，再加上強烈的為國為民意識與衛道精神，為了解決問題，使他們在思想上產生了若干突破，如承認西方武器的精猛，予西人以平等地位等，故終能為日後中國的近代化孕育有新的契機。

由上述的這些思想特徵，我們可以看出道咸同三代的經世致用思想，與一個國家或社會所需要的近代化思想，是有相當差距，甚至與李鴻章等所主張的用夷變夏主張，也有根本的不同。這是何以李鴻章能成為此時期真正從事於近代化努力的代表者，而曾國藩與左宗棠則不能的原因，也是我國近代化運動在思想上與應變圖新的關係較深，與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究不能完全直接整合的原因。